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3年6月30日第18期

本期目录

文摘

李仕林等 清华文革“全面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声音

孙怒涛 清华大学两派之外的第三种势力

史林一叶

何 蜀 重庆大武斗中的“第三条道路”

史实考订

卜伟华 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印章及所谓“清华附中模式”

蓦然回首

庞国义 武斗硝烟中的石桥铺场口

书海泛舟

编辑整理者 《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前言

田健行 注意保存文革史料

《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代后记

编读往来

丁颖来信纠错

阎长贵谈17期

【文摘】

清华文革“全面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声音

李仕林 朱光永 孙之荣 苏德昆 达瓦次仁 段云富

按：本文系作者们应约为清华校友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所写的文章，已经收进该书。本刊征得作者们的同意，特全文转载。

前言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十六年了。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纷纷启动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包括史学工作者和不少文革的亲历者。在文化大革

命的进程中，特别是清华两大派“全面内战”时期，曾经出现过与两大派不大相同，或完全不同的声音。他们反对内战，主张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结束混乱和失控的局面，共同完成文化大革命赋予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任务，达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目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全面内战”时期的一种“非主流”声音。我们称它为“第三种声音”。

在清华两派“全面内战”时期，“第三种声音”有组织的活动相对较少，加之不是当时的“主流”声音，不为研究者们重视。依赖文字了解文革的年轻一代，常常误以为当时的那一代人都陷入了疯狂的内战。其实，随着内战的不断升级，形成了数量庞大的“逍遥派”队伍，他们用脚投了内战的反对票。具有这种观点的人数众多，代表了文革中，特别是“全面内战”发生之后大多数人的呼声。研究文革，不研究这种声音显然是一种缺憾。我们作为清华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在清华内战时期曾经建立了具有“第三种声音”典型特征的组织，开展了活动。历史的责任感促使我们将这一段历史如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我们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引起清华文革中具有相同感受的同志们，回忆自己的经历，将自己所知道的“第三种声音”的相关情况写出来，给研究文革的学者或者为后人全面研究文革历史做参考。

一、对清华“全面内战”的简要回顾

清华和北大处于文革风暴的中心。清华和北大内部的派性斗争，是文革“全面内战”的典型。毛泽东主席正是从这两个学校入手，试图结束“全面内战”，同时又继续推进文革的。

1966年6月1日，从毛泽东主席下令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到1966年底，清华大学经历了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斗争变化。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成立并控制清华大学行政权力为标志，追随毛泽东主席反对“刘邓司令部”的造反派胜利了，“保守派”失败了。清华园内，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转向造反派的行列，形成了强大、统一的造反派队伍。但造反派几乎在统一的同时就发生了分歧。

清华两个主要造反派群众组织——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当时简称为团派或老团）和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当时简称为414派或老四）之间的内战，大体上从1967年开始，到1968年“7·27”结束，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内战刚开始的几个月，是不同观点的大辩论。1967年4月14日，“414串联会”成立，组织分裂正式形成。其后，一边辩论，一边吵架，内战走向激烈。在当时中央高层的压力下，两大派9月份成立联合总部。但真正的联合总部一天也没有存在过，内战继续走向激化。1968年1月4日，两派发生的第一次武斗被北京市卫戍区调解、平息。周恩来总理主导的“二月春风”使内战稍事缓和，并有走向解决的迹象。但后来文革局势的变化，“二月春风”化为乌有，清华重启内战并迅速升级。1968年4月23日，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开始，至“7·27”结束。

清华历来是精英荟萃、人才辈出之地。当它走向迷途的时候，这一特点也在

“全面内战”中显现出来。清华内战有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文斗时间特别长，足有一年以上。当时，全国都打内战。但全国各地的两大派从形成到发展，从文斗到武斗，只经历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许多群众还没来得及搞清楚两大派的分歧到底是些什么，大规模武斗就开始了。相比较而言，全国各地的内战，说理的时间较短，而清华两派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写了无数大字报，出版了大量印刷品，开了不计其数的大小辩论会，广播喇叭昼夜不停地喧嚣。可以说，这些论战曾经令人眼花缭乱。这种状况在当年的中国是很罕见的。清华内战制造了系统、对立的理论，即“彻底砸烂”理论和“红线主导”理论，并产生了“理论家”。“414思潮必胜”的作者周泉缨就是曾经被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名的414派理论家。

其二，清华派性特别顽固，特别具有煽动性、迷惑性。两派均声称自己不是搞派性，而是为了解决路线问题。两派的斗争是路线斗争，甚至说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在文斗的高峰时期，清华的师生员工卷入派性的比例非常之高。文革结束以后的很多年，当年的亲历者，甚至当下研究历史和政治的学者，有不少还在评判哪一派的理论更正确。当年的派性对后来的清华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第三，清华内战牵动着中央高层，不少高层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干预过清华内战。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干预，有的是起灭火作用的；有的是起煽风点火作用的。因此，清华内战具有特别的复杂性。清华内战的最终解决，是由于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了著名的“7·27”行动。

二、“全面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声音”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后，由于各地党委被夺权，加上两大派的激烈内战，全国出现了非常混乱的局面。停工、停产、交通瘫痪，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从当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看，他一方面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文革，同时也在想办法减轻混乱，减少破坏。对于两大派的内战，一开始，他就表示不赞成。并且，随着内战的发展，他的态度一步一步变得严厉。1967年3月，他曾经发出革命的学生们联合起来，“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1967年6月，毛泽东主席又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这里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指的就是两大派的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思潮、“理论”。

清华的两大派，其核心力量都是跟随毛泽东主席“路线斗争”起家的造反派，诞生在文革风暴的中心，对路线斗争有特殊的敏感、癖好和惯性。两派初起时的一系列争论，用当时的标准看，确有“原则性”，甚至精彩纷呈，从而获得清华园内多数人的关注和思考。但是当这些争论发展成内战，并继续向恶性方向转变之后，人们对内战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当时，毛泽东主席掌控的全国主流局势，是引导各地的两大派消除派性、停止内战、促成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并深入地进行斗批改。清华的两大派漠视毛泽东主席停止内战的主张，将路线斗争按照自己曲解的方向不断放

大。在全国主流局势的背景下，清华园内许多人从参与或关注争论，到逐渐走向中间或逍遥。两大派的队伍从高峰时的庞大数量逐渐缩小，中间派和逍遥派的队伍逐渐扩大。同时，清华的另一些人开始对两大派的内战进行反思，并逐渐地发出了“第三种声音”。

1、内战中的忧虑和思考

在内战早期，1967年的5月，团派中出现了“五七串联会”，主张两派能多做自我批评，联合起来。“五七串联会”曾经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多次分别批评两派的一些错误做法，促进两派联合，促进早日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它的主张曾在校内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与两大派强大的声音相比，它显得相对弱小。9月份清华大学革委会流产以后，“五七串联会”逐渐销声了。

整个1967年，在清华园，无论在团派中，还是在414中，许多师生员工迫切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尽快走入“正轨”，结束两派分裂的局面，“复课闹革命”，按照毛泽东主席当年的“战略部署”，进入“斗批改”，完成“教育革命”的重任。很多人对双方“铁杆儿派”无限上纲的做法十分反感。

1967年6月下旬，时任《414井冈山报》出版、发行负责人的414总部委员段云富，在编辑出版第三期《414井冈山报》时，发现一篇名为“革命的大联合万岁”的文章，十分高兴。在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文字修改后，用了大半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在当期《414井冈山报》上。

没想到，报纸出版后，414总部召开特别会议，严厉批判了414内部的“机会主义”。会议矛头直指负责出版发行工作的总部委员段云富，说段是投降主义，是托派。段云富据理力争，说明这篇文章是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精神的，说明大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激烈的争论后来变成了谩骂，甚至有人拍桌子瞪眼睛，指着段的鼻子，骂段是混蛋，要段滚出414。

7月初，段云富的肝炎复发。鉴于精神上的打击和生病等双重原因，段云富给414的第二把手孙怒涛写了“辞职报告”，辞去总部委员，离开414，回家治疗、休养。

8月下旬，从老家返回学校后，何去何从摆在段云富面前。参加打内战吧？不愿意。逍遥吧？不是共产党员应当选择的做法。此时，原巴黎公社战斗组的几位战友、原414中不满派战的老师、同学找到段云富，向段云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成立一个毛主席最新指示学习小组。

开始，他们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文化革命以来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学习了关于反派性、促联合、深入进行斗批改的指示。参加学习的人时多时少，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有时也找一些教师和工人座谈。经常参加的人主要有段云富、魏洪波、林功实、胡平晟、苗日新、陈左一等。经过几次学习讨论后，大家觉得学习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放着清华的一大堆实际问题不解决，光学习有什么意义？于是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到工人中去，到教师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于是分头到9003，到工厂，到200号，了解情况。

几乎与此同时，另外有人开始用列宁和毛主席关于小资产阶级阶级性的论

述，从理论上研究清华两派斗争，认为两派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伪装成路线斗争的派性斗争，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其伪装具有欺骗性。

1967年12月，李仕林给团派的“井冈山广播台”写信，信中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团派战士，对于井冈山广播台的作法想提出自己的一点意见。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可是自从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以来，我们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中很少听见播送批评我们团派自己的文章，总是听到批评414的。我感到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精神。……我建议以后井冈山广播台不播送或少播送骂414的文章，多播送批评我们团派自己的文章。衷心希望井冈山广播台成为执行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成为斗私批修的模范，成为促进革命大联合的模范。如果你们觉得合适的话，请能广播这封来信。”这封信被井冈山广播台置之不理。

2、发出“第三种声音”

大约在十月到十一月间，段云富和战友们逐渐形成了组建一个战斗组织，以反派性、促联合，进行斗批改，完成清华教育革命为基本宗旨的思路。思路形成后，大家分别以个人名义或战斗组名义开始张贴反派性大字报，并决定成立战团。

1967年12月25日，以成立日命名的12·25战团正式成立。当时只有十多个战斗组参加，组成了由段云富、魏洪波、林功实和胡平晟等为成员的战团核心组，推举段云富担任核心组组长。核心组研究后明确表示：战团既不属于团派，也不属于414，而是隶属于9月份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联合总部。并以《清华井冈山联合总部12·25战团》的名义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派性、促联合活动。因为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战团成立后的几天内就起草了上百份反派性、促联合，联合起来进行斗批改的大字报。

差不多与此同时，团派中也有人正在积极寻找已经销声的“五七串联会”，或者同意反派性、反内战宗旨的其它团派成员，在团派中建立类似于12·25战团的组织，同12·25战团一起，共同发出“第三种声音”。经过努力，团派中的类似组织几乎接近建立，但由于主要成员临阵动摇而流产。笔者手头保留的未发表的成立宣言中称：“为什么清华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主要原因是因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了我们的队伍，是因为私字，因为顽固地存在于我们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为此，我们一部分团派同志，怀着打倒派性，为实现清华的革命大联合而斗争的决心和意志，走到一起来，宣告××战团成立了。”

这时候，清华内战已经打了一年。虽然两大派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仍然很大，但内战初起时迷人的理论光环已经褪色，不少人感到厌倦，中间派和逍遥派大量增加，他们希望结束混乱局面，恢复清华的平静。同时，全国各地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纷纷结束内战，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

1968年1月11日，团派“向东支队”贴出大字报《为什么清华两派都不执行最新最高指示》，对两大派一年内战提出了尖锐批评。大字报说：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毛主席指示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团派应该立即停止对414的攻击和批评，主要做自我批评，414的缺点、错误让414自己去讲。同样，414应该立即停止对团派的攻击和批评，主要批评自己，团派的缺点、错误让团派自己去讲。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二十几天来，事情却完全相反，两派不但不停止攻击对方，不但不做一点儿自我批评，反而变本加厉，把派性斗争升级又升级，内战烟火弥漫。大字报、广播、开大会，完全听不到一点儿自我批评，听到的只是无休止地攻击对方，甚至不惜降低革命造反派的风格，采取谩骂、造谣、无限上纲等低劣手段。两派的广播里天天都在唱着高调：‘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但是，谁都不愿意做自我批评。

“我们经常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现在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多做自我批评’，但是清华的两派不但不‘多做’自我批评，就连‘一点儿’自我批评也不做。对毛主席的指示，学了不用，说了不做，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正在清华园存在着。”

大字报提出：

“今天，清华的两派头头为什么都不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呢？为什么都顽固地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派别斗争呢？为什么要自作聪明地，正路不走走歪路呢？”

大字报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进一步质问：

“看今天的清华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人过问，内战烟火弥漫，我们不能不问：作为两派头头的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任传仲、陈继芳、孙怒涛、沈如槐、汲鹏、刘万璋、宿长忠等同志，难道你们脑袋里的‘私’字还少了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呢？”

大字报还对两派群众提出：

“在党性不香、派性不臭，派性挡道、党性让路的清华，在两派都不执行最新最高指示的今天，难道不应该对这种危害革命的私字和小资产阶级派性进行斗争吗？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吗？不打倒它们行吗？”

“有一部分同志对清华大联合的前途感到悲观，他们不想参加派性斗争，但是又缺乏勇气起来同派性做斗争。这些同志的悲观情绪是完全不正确的。

“由于今天的清华园无论哪一派都还是派性高于党性，坚持党性的同志很可能暂时不被其它同志理解，可能会被骂成‘折中派’、‘调和派’、‘没有阶级斗争观点的糊涂虫’、‘右倾’、‘老机’、‘动摇分子’、‘混进老团中的老四’、‘混进老四中的老团’，甚至可能受到排斥和打击，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坚持斗争，群众是会看清楚的，群众是会站到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来的。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一切悲观主义的态度都是没有根据的！”

“让我们用毛主席的教导来勉励自己，为彻底实现清华的革命大联合而斗

争。”

1968年1月17日，在此前上百篇大字报的基础上，12·25战团将其综合、归纳后写出长篇大字报《派性五十例》。全文从六个大类、五十个小类列举了两大派的派性，对派性进行了系统批判。这些类别涉及当时背景下两大派所有主要的争论领域，并且轮番列举两大派在这些领域各自的派性表现。这篇大字报用大家熟知的事实反驳了两派内战是“路线斗争”的说法。说明派性不是两大派身上的个别现象，次要现象，而是两大派的主要政治特征。派性已经成为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障碍。

以上两篇大字报，是“第三种声音”具有代表性的大字报，阐述了“第三种声音”对当时清华局势的观点和立场。在这两篇大字报上都有很多留言。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声称“团派—414派的斗争是路线斗争”的“杆儿团”和“杆儿四”都咒骂这两篇大字报。

团派中类似于12·25的战团未能成立起来，来自团派、中间派、逍遥派而又赞同反内战、促联合的学生、教师、职工纷纷加入12·25战团。这里的人不问谁以前是哪一派的，只是为了反内战走到了一起。参加12·25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更没有成立各系的分部。有的人今天来了，明天可能又离开了。但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核心组认为，如果两派真正联合起来，12·25战团将解散，回系回班闹革命。因此，12·25有过多少人，谁也没记过，谁也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团派和414派相比，它非常弱小。经常参加活动的，大约有几十人，参加12·25召开或发起召开的会议或活动的人数，曾经达到过几百甚至上千人。但这与414高峰时7000多人的组织，团派上万人的组织，完全无法相比。12·25战团的目标是希望依靠清华自身的力量，以毛主席关于反派性反内战问题的若干指示为武器，结束清华内战。

在此期间，也有不少人访问12·25战团。他们表示，赞同12·25提出的目标，但深刻质疑其实现的可能性。他们同意12·25的基本观点，同情12·25的努力，而不参与12·25的组织与活动。12·25战团对他们表示理解，欢迎他们常来走走，聊聊。

3、促头头活动

1968年1月16日，12·25战团在中央主楼217邀请两派头头座谈大联合问题。团派方面鲍长康、马小庄等，414方面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龙连坤等应邀出席。两派主要头头，除蒯大富外，几乎都来了。12·25的同志尽力做说服工作，促进两派靠拢。但两派头头谈不拢，没什么结果。由于蒯大富没来，会后，段云富再次找蒯大富“谈心”，仍无果而终。

1月25日，12·25战团专门邀请蒯大富座谈反派性、促联合问题。原“五七”串联会的负责人栾德富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开得平心静气，双方都直率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12·25战团认为，清华的一年内战，方向错了，两派都要悬崖勒马，蒯大富应该为促进大联合发挥主要作用。蒯大富说，两派的斗争主要是路线斗争。团派中也有派性，派性干扰路线斗争，我也对派性很头疼。但克

服派性，是为了解决路线分歧。你们把两派的斗争主要看成派性斗争，这是不对的。

围绕这些问题，双方都展开了说理斗争。这次座谈会时间不短，座谈双方都能较自由地展开争论。但12·25的同志们发现，蒯大富的内战观念根深蒂固，没有一丝松动。更为奇怪的是，蒯大富将这次座谈会看成拉拢12·25进一步向团派靠近，分裂、瓦解、打击414的一次机会。这让参加座谈会的12·25的同志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但这也让12·25的同志们了解了两派头头们的立场和思维方式，了解了制止内战的艰巨性。

4、“第三种声音”的内部讨论

12·25战团有过数不清的内部讨论会。与当时的两派一样，12·25的同志不可能不关心政治热点问题，尤其是路线是非的争论。

众所周知，文革中，路线是非是至高无上的。谁在路线上站错了队，谁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当时的两派都发誓自己代表正确路线，都有相当强硬的上层背景。而要在没有任何高层背景的情况下，公开发出“两派都错了”的声音，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讨论这类问题时，12·25内部也是意见纷呈，难以统一。对如何处理路线争论与反派性斗争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12·25本来就是非常松散的组织，这些分歧更容易影响12·25战团的行动。

但12·25战团的核心成员始终认为，路线问题的是与非，对与错，并不以两派为界限。两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各有对错。毛泽东主席虽然一直把“路线斗争”放在文革各项工作的首位，但从来也没有将全国两大派之间的斗争看成路线斗争，相反，他始终将其称为“派性”、“内战”。在两派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是非没有可能争论清楚。只有联合起来，结束对立和混乱，通过调查研究，通过理性地辩论，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同时，只有结束内战，才有可能沿着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斗批改”和教育革命的部署往前走。沿着对立和混乱的道路走下去，对清华，对国家只能带来灾难。从这个角度讲，两派都是错的。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12·25不对当时的所谓“路线是非”表态。同时，也并不认为我们自己就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在路线问题上我们提不出，也不愿意提出“第三种意见”。我们只把反派性、反内战、反武斗当成自己当时的唯一任务，紧紧抓住不放。

12·25战团成立初期的代表作《派性五十例》，主观上站在非常“客观、公正”的立场，从两派争论的若干具体问题入手，分别指出两派在这些问题上的派性表现。后来我们在讨论中认识到，具体问题上的是与非是非常复杂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很难“客观、公正”得了。而且，不论两派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少是与非，不论谁对得多，还是错得多，两大派在总体上的公开对立、打内战都是错误的。两派的总体错误高于具体问题上的对错。

为了坚定反派性、反内战的立场，12·25的一些同志还尝试对全国广泛产生的派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企图站在较高的角度对影响文革进程的全面内战这

个普遍问题，有较深的理性认识。他们从革命导师那里寻找武器和力量。其研究心得经常在 12·25 内部交流讨论。较典型的是，尝试将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论述用于解释这种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当然，这些都是在维护文革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5、反内战游行

与两派头头的两次座谈会表明，两派头头的工作都很难做。但发出“第三种声音”的同志们并没有气馁，想反过来做两派群众的工作。1968 年 1 月中旬，12·25 战团组织了全校性的反派性、反内战、促联合的大游行。大家举着标语、横幅，喊着口号，从二校门出发，途经礼堂区，经大操场、明斋、新斋、4 号楼，过小河返回主楼。游行人数从一百多人不断扩大，到达明斋后达到 300~400 人，返回主楼时仍有 50~60 人。

6、促联合大会

为了争取两派基层群众更多地站到反派战或中间立场上来，决定以 12·25 战团的名义，召开一次全校性的反派性、促联合大会。大会地点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时间为 1968 年 1 月 24 日上午。战团核心组将人员分成两组，一组去动员和组织发言，另一组负责会务，为这次大会倾力准备。会务组布置了会场，贴出了海报，刷了一些大标语。这次组织的发言，不只是 12·25 的同志，还组织了并未参加 12·25 但反对清华内战再打下去的一些同志。这些工作顺利进行。只剩下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广播大会海报。当时的情况，如果不广播海报，知道这个大会的人就会很少，会议可能没有多少人参加。但广播站都在两派手里，说服、争取两派广播大会海报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当时设想，争取让两派的广播站都广播这份海报，避免一派广播，尽量减少误会，争取较好的效果。

1 月 22 日晚上，原团派的李仕林、张战烽一起找到蒯大富，请求团派的广播站广播会议海报。蒯大富当时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市革委会多次到清华促进大联合，蒯大富至少在口头上不便反对反派性、促联合的行动。所以他同意广播我们的海报。第二天中午，李仕林拿着海报去找团派广播站，但他们一看海报的内容，拒绝广播。李仕林又到静斋再去找蒯大富，蒯给井冈山广播站负责人刘泉打电话，说了半天，做了许多工作，看样子是答应了。但直到晚上还是没有广播。晚上八点，两人在主楼 217（12·25 战团主要活动地点）给刘泉打电话询问，刘泉明确表示不答应。刘泉是团派总部委员，著名的“铁杆儿”老团，掌握着团派喉舌。晚上十一点，张战烽又给刘泉打电话，仍不答应。后来，张战烽愤怒了，在电话上与刘泉反复争吵，刘勉强答应，但又说广播员不答应，要给广播员做工作。直到 1 月 24 日早晨，仍未广播海报。1 月 24 日上午八点半，张战烽又去井冈山广播站，大吵了起来，吵还是不解决问题，团派广播站坚决拒绝广播。

与此同时，12·25 战团原 414 派的魏洪波、段云富也找到 414 广播站，要求广播召开此次大会的海报，但也被拒绝。后来经过多次交涉、说服、磨嘴皮，或许因为他们俩都曾经是 414 派的总部委员，在 414 中有较广泛的人脉，直到 1

月 24 日上午，大会召开时间快到了，414 广播站才将大会海报广播了几遍。好在 414 广播站直播了大会实况，全校各个角落都能听到这次会议的发言。

大会在校大礼堂如期举行。由于知道此次会议的人很少，也许还有我们对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参加大会的人远远少于预期。一千多个座位的大礼堂，坐了大约两百多人。在当时的两大派看来，这是对 12·25 反派性、反内战的一个讽刺，一个打击。尽管如此，参会的人仍然按照预定议程热情饱满地开完会议。记得大礼堂后排过道上不断有人进出，有的是来看动向的，有的可能是来看笑话的。这是在大礼堂召开的唯一一次反派性、促联合的大会。

7、迎接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原定 1968 年 1 月 5 日进校，帮助两派消除派性、促进联合。因 1 月 4 日清华发生第一次武斗而推迟了。2 月 13 日，海军宣传队正式入驻清华。由于 12·25 战团同海军宣传队入驻清华的目的高度一致，12·25 战团立即与海军宣传队取得联系，向海军宣传队汇报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已经做过的努力，并表示愿意在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配合宣传队，为消除派性、停止内战、促进联合再尽一份努力。在同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交流的过程中，12·25 战团的代表发现：军宣队将 12·25 战团误解为清华的第三派，担心会因此使大联合更加困难。针对这种担心，12·25 战团的主要负责人段云富等向军宣队反复表示，12·25 战团发出了反对内战的“第三种声音”，但我们不是第三派，我们没有私利，不在大联合中谋取任何席位，大联合实现之日，就是我们解散之时。终于获得了海军宣传队的理解，并对此表示赞赏。

此后，12·25 战团始终同海军宣传队保持了经常的联系，向他们报告情况，请他们释疑解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受到他们的指点和鼓舞。海军宣传队逐渐了解了 12·25，相互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8、参加头头整风

1968 年 2 月 5 日，由北京市革委会主办的首都大专院校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式开学。这个学习班是为了解决各大学的派性，促进大联合而举办的。清华两大派的主要负责人都被指定参加。12·25 战团感到这是解决清华问题的极好机会，决定配合学习班，多做头头和群众的工作。

1968 年 2 月 9 日，12·25 战团部分同志到新疆驻京办事处（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在地）贴出给两派头头的公开信和两条标语，希望他们认真学习，真心实意实现大联合。414 的头头沈如槐、孙怒涛、汲鹏从学习班出来，帮 12·25 战团的同志贴大字报，表达他们对促联合行动的支持。此前的 2 月 6 日，团派的《井冈雄鹰学习班》请 12·25 战团去炮轰团派的派性。12·25 的段云富、魏洪波、胡平晟在学习班上发言，表达两派群众强烈要求实现大联合的愿望，希望头头们切实斗掉“私”字，不让群众失望。

在头头们被北京市革委会召去办学习班的同时，校内基层出现一些促联合的学习班。开始是两派分开办，后来出现两派合办的学习班。12·25 战团于 2 月 12 日邀请一些联合举办学习班的单位开会，讨论形势，并研究如何进一步打倒

派性、促进联合。

2月13日，海军宣传队进校的当天晚上，12·25战团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军宣队进校以后的形势和任务。会议认为，清华出现了难得的好形势，消除派性、实现联合出现了难得的好机遇。12·25战团必须抓住机遇，配合北京市革委会和军宣队，努力做好工作，争取清华早日实现大联合。

1968年2月16日，团派总部发出了《关于目前我校大联合若干问题的意见》，作为内部参考文件发到团派各战斗组学习使用。这个文件完全站在派性立场，竭力维护派性，反对党性，实际上是对抗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的内部指导性文件。

9、解散12·25战团

1968年2月18日，12·25战团主要负责同志认为，鉴于北京市已举办两派头头的学习班，军宣队已进驻清华，各系两派均在举办学习班，继续以12·25战团的方式来反对派性、促进联合，已经不合适了。因此建议解散12·25战团，全体成员回班回系回单位，努力促进办好各单位的学习班，用新的方式为清华的大联合做贡献。这样做也是我们兑现向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曾经做过的承诺。

虽然许多成员反对这一意见，认为上述看法对清华反派性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但也认为回到各自单位，促进本单位消除派性、实现联合，是当前形势下最紧迫的任务。12·25战团的同志纷纷回到本系、本班、本教研组，参加本单位两派的学习班，促进基层组织的联合。同时，还有同志到校办工厂的工人中做工作，促进那里的联合。

10、为“二月春风”奔走

1968年2月2日周恩来总理讲话说：“革”与“保”已经不是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了。当前的路线斗争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党性还是派性的斗争。这是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将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提到路线的高度。在周总理讲话的促进下，全国出现了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高潮。当时，周总理的讲话及随之出现的好形势被称为“二月春风”。这个讲话也极大地鼓舞了清华大学12·25战团的同志们。

经过各方面大量的促进工作，工化系准备成立革委会筹备组，综合机械厂准备成立革委会，这标志着那些地方的大联合已取得相当的进展。但是全校大部分单位没有进展，校一级头头也没有进展。工化系和综合机械厂想串联一些单位搞一次大行动，去促进校一级头头的大联合。经过串联，校内更多的单位决定联合发起“清华大学革命群众促头头掀起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新高潮大会”。大会成立了筹备处。原12·25战团的同志负责大会筹备处的后勤和联络等具体工作。段云富是筹备处的负责人之一。这个会越筹备规模越大。

1968年2月29日，“清华大学革命群众促头头掀起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新高潮大会”在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大专院校学习班新地点）召开。群众热情非常高，北京市委党校大礼堂被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坐满，估计有1400人之多。清华大学学习班的两派头头都到了会，领导学习班的解放军也参加了。学习班的负责人、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讲了话。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在

主席台就坐。两派群众（或未参加任何派别的群众）积极发言，要求头头们认真斗私批修，早日实现清华大学的大联合。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给要求联合的群众很大鼓舞。与一个月前 12·25 战团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召开的流产的大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当天晚上，土建系达成联合协议，成立土建系两派联合勤务组。

11、再聚集

但好景不长，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中央文革 2 月 21 日讲话，是关于“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的。此事与清华的团派教工组织“红教联”相关，414 是首先开始大规模攻击“反动组织红教联”的。团派为了自保，也开始行动。3 月 8 日，土建系的团派把“红教联”的陶德坚、朱启鸣、来晋炎等几个头头抓了起来。大联合的形势迅速恶化。414 准备全线发起进攻。1968 年 3 月 9 日，团派召开战斗组长会，准备迎战 414。

1968 年 3 月 15 日，由聂元梓串联发起的首都 8 个高校在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驻地召开第二次串联会，炮轰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骂学习班方向路线错了，是往革命小将脸上抹黑，是“修养式”的闭门思过。有人甚至将矛头指向周总理。2 月 2 日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讲话。当时，聂元梓、蒯大富头脑已经膨胀到极点，连周总理的话都可以不听，更未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放在眼里。谢富治和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相当软弱，他们领导的首都大专院校大联合学习班事实上被冲垮了。

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原 12·25 战团的同志忧心如焚，又重新聚集拢来，多次联系海军宣传队的负责同志谈话，寻找解决办法。海军宣传队的感受，与 12·25 战团的同志一样，也苦于找不到办法。

已经解散了的 12·25 战团的同志重新聚集到中央主楼 217，研究挽回局势的对策。

12、武斗前夜

中央文革有个 3·15（本刊注：指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的讲话，其中江青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3·18（本刊注：指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其中江青说：“右倾不是苗子，已有行动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讲话，说“反右倾、反复辟、反翻案、反分裂”是当前的主要任务，随即又提出了“打倒杨余傅”的口号。团派认为这是亮明路线斗争旗帜，反击 414 的大好机会。414 也奋起反抗。反内战，促联合被两派都抛弃了。此时，北大已经乱起来了。北大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发生武斗。清华看来马上就要乱了，大字报区的内战气温已经大大上升。

1968 年 3 月 25 日，北大发生武斗。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去北大制止武斗。

1968 年 3 月 28 日，北大再次发生首都高校空前的大规模武斗。事态变化非常突然。

此时，清华不论哪一派，都在否定“二月春风”。两派都指责前段时间首都高校出现的反派性、促联合的浪潮，说它否定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重开内

战的清华园，两派的对立程度迅速超越以往任何时候。对两派的劝说已经毫无用处。

196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清华两派均将毛主席的指示和两报社论为我所用，均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内战的空气进一步升级。12·25战团的同志非常困惑，在主楼217开会讨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该如何理解。社论给人的印象是：不知道它究竟是支持内战，还是反对内战。一贯以毛主席公开发表的指示为行动指南，不愿依靠“小道消息”的12·25战团感到迷茫。

1968年4月21日，团派的广播站全天静默，听说是搬家，准备武斗。

此时，已经毕业分配，因故回到学校的段云富，仅找到12·25的魏洪波。在了解了清华的最新局势和12·25的同志们为制止武斗所做的努力后，他委托魏洪波向12·25在校的战友问好，并请他转告见到的战友，请他们注意安全。他提醒大家，光靠我们这手无寸铁的几十个人是无法制止武斗的。段云富认为，两派已经走向了他们的反面，相信中央绝不会对两派的胡闹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两派武斗队分别占领各学生宿舍楼，构筑武斗工事。全校绝大多数学生纷纷打整行李逃离学校。成千上万人的逃离，构成了清华蔚为壮观的“难民潮”。在清华百年历史上，或许只在日寇侵占华北，清华南迁时有过类似情况。估计两派留校参加武斗的总人数不足千人，95%以上的师生员工选择了逃离。

这时，12·25战团的同志意识到，依靠清华自身的力量阻止内战的继续和武斗的发生，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尽管我们到处收集情况，彻夜讨论，也想不出办法。

1968年4月23日，清华园大规模武斗终于发生了。从此直至“7·27”工宣队进校，这就是清华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百日大武斗”。

武斗发生以后，聚集在中央主楼217的12·25的同志们，愤怒、焦虑到极点，极力想做点什么来制止武斗，却又做不成任何有分量的事情，因而感到极其无奈。

4月23日中午，12·25战团共十人，怀着对清华武斗的深切忧虑，走访了《人民日报》社。目的是请教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提到的，“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应该如何理解。这篇社论是反对所有派性，还是只反对经过“分析”后的某些派性？“二月春风”后掀起的反派性斗争是否要否定，总理2·2讲话是否继续适用，清华今天发生大规模武斗，这种派性是否该反等等。说穿了，是要求对4月20日社论做出解释。《人民日报》评论组的一位同志接待，群众组的一位同志参加。他们的回答模模糊糊，不知道他们对清华武斗是什么态度。

13、无奈和焦虑

各学生宿舍楼被两派占领以后，12·25战团的同志也被迫离开了原来的宿舍，有的迁往校外，有的暂住中央主楼217。也有不少人离开12·25战团，或

者回老家，或者停止参加 12·25 战团的活动。留下来的人天天聚集在主楼 217，研究清华园的形势，寻求回答“怎么办”。

能够想到的办法都想了，比如刷反对武斗的大标语，要求两派停止武斗。但两派已经杀红了眼，谁听？有同志提出，尽可能多串联一些人，组织全校大游行，呼吁两派停止武斗。这算是一个有可能产生效果的主意，但规模小了不行，而且有很大的风险。海军宣传队也非常支持这个主意。但终因不能找到足够多的人参加，这个设想未能实现。胡平晟等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到工厂去，动员工人起来制止武斗。便分头到 9003 和校办工厂，动员起近百人的队伍，并准备继续扩大组织，以便出面制止武斗。但是终因力量仍然太弱小，未能实施。面对惨烈的武斗，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事情，能够做什么事情，很是苦恼。住在中央主楼，消息十分闭塞，到处打听情况，但仍然了解不多。尤其是不知道中央对清华武斗是什么态度，极感焦虑。

武斗发生以后，414 派占领了中央主楼的 4 层以上，4 层以下仍允许“和平居民”居住，12·25 战团的大本营 217 房间得以保留。但 5 月 20 日，414 占领了全部主楼，12·25 战团被赶了出来，失去了最后的存身之地。12·25 战团的同志，在校外能找到住处的，留在了北京，找不到的只好回家了。留在北京的也做不了任何事情，只能近距离观察清华的事态发展。这样，12·25 战团事实上又被迫解散了，全体变成了逍遥派。

1968 年 6 月初，在北京房山工作的段云富接到电话，被告知两派在东区浴室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其原来所在战斗组——“巴黎公社”的钱大耀因武斗受伤“被俘”，被团派关押在 1 号楼的“监狱”里。414 托人联系段云富，希望这个非团、非四，又认识很多团派头头的人能够前往探望，了解伤情。段云富立即请假从房山回城。只身回清华“探监”。

回到学校后，段云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由于处于两次武斗之间的间歇期，学校冷清到有点阴森。二校门到礼堂周边马路寂静无人，偶尔看到一两名持矛戴盔的“武士”进出于科学馆。团派办公室主任张学森看在大串联期间战友的情分，看在老段非四的身份上，开了路条，允许他前往一号楼“探监”。

1 号楼中间楼梯站岗的团派卫士们手执长矛，看了路条并不放行。他只得从侧面寻找通道。两侧的楼梯全部被床架、床板封住，好在还可以钻过去。爬上 4 楼，看到团派保卫组副组长孙茂。大概是接到张学森的电话，孙茂给这个非团非四的人一个“面子”，允许他去看钱大耀。并派了两个人“跟随”，一个做记录，另一个手持短矛警戒。进“监房”后，那位武士将短矛嚓的一声扎在桌上，还说了一声“老实点”！

离开 1 号楼时，段云富见到了团派保卫组组长崔兆喜，这也是段的一个老熟人。段骂了崔，说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崔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路线斗争的严重性你们这些人不懂。”探监任务算是完成了，但段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中央知道清华的情况吗？为什么不管管？让这些“无知”的青年学生这么胡闹下去怎么得了！同时，他也深感自己的无能、无力。事后又想，历史是最公正也最

严酷的审判者，挑动武斗的人和犯下杀人罪行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住在校外的 12·25 战团的同志，不时地会回清华了解一些情况。百日武斗发生以后，住在林学院的朱光永曾见到同班拿长矛守卫武斗工事的团派、414 派同学各一位，分别对他们进行劝说，直到他们离开武斗中的清华园，回了老家。

14、7·27

“7·27”那天，也像往常那样，朱光永回学校了解情况。“7·27”上午 10 点多钟，在强斋附近，朱光永听到外面一阵一阵口号声，连忙下楼观看。从化学馆那边有几队工人手举红宝书，高呼“反对武斗！”“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等口号，往东走来。前面一队是女工队伍，有 100 多人。他看工人宣传队来了非常高兴。几个月前，12·25 战团本来就想在清华园组织上千的师生员工举行制止武斗的大规模游行，但没有成功。现在，校外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来了，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呀！朱光永毫不犹豫地跟他们一起走，来到大礼堂前。

大礼堂前广场已经有近 10 支宣传队，都有军代表。科学馆东大门已打开，离门口 10 多米广场草地上围坐着 20 多个学生，头发很长，脸色苍白，体质瘦弱，听说是原驻守科学馆的 414 派同学。他们身后有两个大木柜，里面暂时封存着战死者。团派广播站正在喊：杨余傅的黑后台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来迫害红卫兵小将！朱光永在广场走动观看，一个军代表过来向他宣传反对武斗。朱光永说：“我就是主张大联合、反对武斗的，早就盼你们来了！”军代表就叫他带一支队伍去东区某一地点。随后，朱光永把那支队伍带到了工宣队要去的地方。

由于当天所有校门被封锁，无法出校，朱光永当晚住在了 12·25 战团教师苗日新家中。除了在校教职员工，朱光永是 12·25 战团中唯一亲眼见证“7·27”的学生。回到外地躲避武斗的 12·25 战团的同学，听到“7·27”毛主席派大批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衷心拥护。荒唐的武斗和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了！

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7·27”，本意是为制止清华武斗而量身定制的，其本意是一次和平行动。但由于遭到顽强反抗，“7·27”变成了一次强制性行动。为制止武斗，工宣队付出了血的代价。内战期间和“7·27”制止武斗的过程中，几十名清华学子、干部、教工和工宣队员死于非命，数百人受伤，几十人终生残疾。

在 1949 年解放军进攻北平郊区时，由于毛泽东主席的命令，清华得以完好保存。但在文革中，由于老红卫兵的“破四旧”、两大派的内战和武斗，以及其它种种“活动”，使清华园这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创伤。

大规模武斗发生以后，12·25 的同志们明白，清华内战正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地奔向自取灭亡的深渊。没有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者的直接干预，清华内战难以结束。在那种情况下，12·25 战团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只能静观局势的变化和中央高层的行动。制止武斗，结束内战，恢复秩序的愿望终因毛泽东主席发动的著名的“7·27”得以实现。

“7·27”不仅强迫清华两派结束了长达1年零7个月的内战，解散了清华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而且结束了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从此开始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阶段。“7·27”是中国文革的重要转折点。

三、反 思

从历史角度看，清华大学的内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清华内战中“第三种声音”的出现也具有典型性。全国各地、各单位，打内战、搞武斗的造反派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人数上却只是少数。多数老百姓厌恶内战，反对武斗，但却处于无权的地位，敢怒而不敢言。据我们了解，在全国敢于发出反对内战和武斗的“第三种声音”的很少，绝大多数人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脱离派性内战，或远离武斗现场。而清华的“第三种声音”不但形成了组织，还开展了相当多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文革中，为什么会出现各种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两派组织为什么内战不止，并升级为武斗，出现“全面内战”这种怪现象？基层群众反派性、促联合的行动为什么没有效果，而最高领导者组织的一次行动就可以中止武斗，改变文革进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研究文革历史时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清华大学的“全面内战”虽然发生得早，持续时间长，两派斗争也十分激烈，但反对内战、反对武斗的“第三种声音”几乎一开始就伴随内战而产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五七串联会”（团派）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12·25战团（非团非四派）之间，虽然没有任何组织和人员方面的联系，但它们都是清华“全面内战”期间发出“第三种声音”的组织。两个组织的正式存在时间从1967年5月到1968年2月，合计9个月。由于12·25战团在1968年3月以后的再聚集，实际上一直存在到1968年“7·27”工宣队进校。所以这两个组织的实际存在时间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也就是说，在清华大学长达一年零七个月内战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第三种声音”发出。在两派的内部，也不时有“第三种声音”产生，包括其领导层。

至于用消极方式、沉默方式不参加“派战”、内战，或与内战保持距离，不参加武斗或者反对武斗的，则在全面内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绝大多数。这是清华大学“全面内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清华两大派与全国的两大派一样，曾经都是毛泽东主席支持过的造反派，是他非常看重的文革先锋队。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曾经想从红卫兵领袖中培养一批接班人，将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扶上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岗位。全国两大派，包括清华的两大派，为争夺可能到来的这些权力，不惜杀红了眼。文革初期，本来被认为正义的造反行为，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两大派的丑陋行为迅速脱离了曾经拥护文革的广大群众。

毛泽东主席发动“7·27”，只是为了结束全国的内战，并不想结束文革。“第三种声音”虽然在客观上符合他扭转全国混乱局面的意图，但不是他继续进行文革赖以依靠的力量。所以，清华的“第三种声音”，虽然曾经同海军宣传队有过

密切的联系，也曾经通过当时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记者向上层反映过情况，但“7·27”后，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宣队进校后，从未肯定过“第三种声音”，其原因也在于此。

至于清华为什么没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结束内战，防止武斗的发生，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12·25的同志们也曾为此深感遗憾。如果清华当年能依靠自身力量结束内战，就不会有“7·27”；如果没有“7·27”，文革轨迹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了。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但回过头看，全国发生两大派内战是历史的必然，它是由文革发动的目的与方式决定的，也与中央高层存在两种声音密切相关，与某些人的私欲膨胀密切相关。在踢开各级党委后的无政府状态下，不发生内战和武斗反而是令人奇怪的了。这是发动文革本身带来的恶果。清华两大派不同于全国其它地方、其它单位。清华两大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强大程度势均力敌，背后都有文革高层的支持。武斗前的文斗时间长，都制造了与文革命运休戚相关的理论体系，以显示自己是最正统的文革派。两派都目空一切，都想争当全国造反派的领袖，都想维护本派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些特点，使清华很难依靠自身力量结束内战。周总理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干预，也无济于事。

我们不赞同毛泽东主席本人支持两大派的分裂、内战和武斗，从而形成全国全面内战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之初始料未及的。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们熟悉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之初、之中，以及文革晚期公开发表的各种讲话，了解他的各种公开行为。从所有这些讲话和行为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席一开始就反对两大派的分裂、内战和武斗，而且不断地批评、告诫造反派，努力将造反派的这些脱轨行为引导到自己希望的轨道上来（“将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之后，他对造反派的批评和告诫越来越严厉。但清华的两派对他的指示、告诫长期置若罔闻。于是，他不得不采取“7·27”那样半文半武的大规模行动来制止清华的派战和武斗。

从当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发动“7·27”行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不能继续容忍造反派长时间的胡闹，并因此影响他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把造反派全都打下去，因为造反派是他支持和扶持起来的，是文革的先锋。

文革后期，毛泽东主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他提出要研究因这两个错误带来的“有所不足”方面。他没有将两个错误推给任何人，而是算在文革的账上。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毛泽东主席本人以外，没有任何其它人敢于公开指出文革的这两个错误。这本身足以说明，两个错误都不是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其实，考察文革的全过程，毛泽东主席一方面不断地发动群众，打倒他要打倒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他又在不断地纠正“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种种错误。1968年他发动“7·27”，并随后结束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就是典型的纠错行动。当时，它符合全国的民心，顺应全国的民意，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确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研究文革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把文革中的一切错误都推到他一个人的头上，例如说他发动了文革中的“全面内战”。我们更反对将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无限夸大，将其妖魔化。

结束红卫兵运动，虽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纠正“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但也必然伤及文革自身。这充分说明，文革的发动和发展过程，天生就酝酿着失败。

当年聚集在 12·25 旗下的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们，对文革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与觉悟。其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在文革初期是拥护文革、支持文革、参加文革的。其中的学生，不是在组织上加入过红卫兵，就是在思想上加入过红卫兵。1967 年，清华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后，这些同志逐渐脱离了红卫兵队伍，公开反对两大派的胡闹。当时，敢于挺身而出，公开发出“第三种声音”，不但需要相当的勇气，而且需要对文革前景做出明确而坚定的判断。但反内战、反武斗、促联合始终没有脱离毛泽东主席的文革思想和文革轨道，呈现了显著的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性。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后来更顺利地接受对文革的否定，包括对全国两大造反派的否定。

当年清华内战中的某些头头，四十多年后仍然宣称，当年他们之所以另立山头，就是反对文革，否定文革。这似乎在告诉人们：他们是先知先觉者，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在我们这些亲历者看来，这只能糊弄那些不知内情的人，说轻一点，恐怕也只是一场闹剧而已。

清华内战的发生，两大派都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两派都是错误的。这在结束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期间，早就由清华官方做出了明确的结论。而且，当时的中央采用了清华的判断，并推向全国，得出了全国的“两大派都是错误的”结论。但遗憾的是，由官方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在描写清华武斗时，却将原因只归结到其中的一派（P798）。虽然，中共党史第二卷对文革的叙述总体上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但对清华这段历史的描述，却值得商榷。

不少学者热衷文革史的研究，也有不少亲历者纷纷撰写文革回忆录。但在有些文章中，真相与假相混杂，求真与歪曲相伴，是不能不令人担心的。一些描写文革的“文艺作品”更是将文革妖魔化，将参加文革的红卫兵妖魔化。这是又一种偏离历史真实，以偏概全形而上学的做法。这不仅会让今天的年轻人感到不可思议，还会遗患后人。

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中无法删去的一页，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十分认真地总结的一页。文革在中国发生，有其历史的逻辑。如果我们要真心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以免在今后复兴中华民族的征途中不再重复类似的错误，就应该认真分析文革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如果不能全面地、客观地总结历史教训，走出文革的目的就不可能彻底实现。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想象文革的真实，只能以当时发生的事实去寻求原

因、结果和规律。但反其道而研究文革的文字、回忆录、文学作品并不少见。

例如，文革是亿万人民群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自愿参加的阳光下的政治运动。但不少文字却将其描述成毛泽东主席在黑暗角落里发动的一场阴谋。这就背离了最基本的事实。

1966年8月1日~12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中央一致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几十年来从未听说那次会上有人投过反对票。那么，可以推论，包括参会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遭受迫害的一大批老同志在内，尽管内心有种种想法，但仍然举手投了赞成票。这是毛泽东主席通过党的正常组织程序使文革合法化。那么，发动文革，就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而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换句话说，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文革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发动的。

既然如此，那普通群众支持文革、参加文革，就是响应党的号召，就是跟党走。这在当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现在的某些文学作品却把当年的多数群众描写成一开始就反对文革、抵制文革，只有少数有问题的人才参加、拥护或支持文革，从而把当年的多数群众妖魔化，使文革变得不可思议。用这种脸谱化、简单化的手法去描写一场复杂的政治运动，背离了最基本的历史真实。

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中的8月4日晚上，周恩来同志率领参会的一半中央委员来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代表毛泽东主席给蒯大富平反。应全校师生员工的要求，邓小平同志也在大会上讲了三句话。其中的第三句话是：“我衷心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当年在场的两万多清华师生员工亲耳听到的。

在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有人提出党的九大、十大应认定为非法。但遭到小平同志的坚决否定。小平同志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九大、十大等文革中召开的党的最高层会议，其政治决定是错误的，但其组织程序却都是合法的，不应该被认定为非法。这同遵义会议以前党的有些最高层会议的情况非常相像。

毛泽东能够在多数老同志内心并不赞成的情况下发动文革，并以党的决定的形式使其合法化，与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破坏密切相关。这个问题至今研究得很不够。例如，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什么原因，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而遭受严重破坏的？毛泽东同志本人的因素是不是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的唯一原因？为什么全党那么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未能阻挡这种破坏的发生？诸如此类的最应当研究的问题，至今未见答案。

现在，一谈到文革的错误，几乎都归结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因此，也是不科学的。这样研究文革史，没有任何进步作用。企图以全面否定毛泽东，或者否定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从而解释几十年来党所犯的所有错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其实，毛泽东被妖魔化了，共产党也就被妖魔化了。最后，必然是以否定共产党作为终结。

就文革错误而言，毛泽东主席当然应该负第一位的最大的责任，因为他是第一把手，总体方针政策是他提出来的。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尤其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未能阻止毛泽东主席个人独断专行，党中央领导集体应当负有相应责任。深入分析这段历史，对于今天如何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也不赞同把文革仅仅看成中央高层的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主席晚年，中央高层的确存在着权力斗争。但也确实包含着治国理政观念和路线方面的巨大分歧。直到病重、病危期间，毛泽东仍然念念不忘继续进行文革，并说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虽然，这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的悲哀，但这也说明了毛泽东并不仅仅把它看成一场权力斗争。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诸多问题，为此做了注脚。

文革初期，很多普通群众积极参加，除了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外，对干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非常不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毛泽东主席严重夸大了干群对立，将一大批干部看成走资派，错误地使用了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使用过的“群众运动”方式，企图以这种手段解决防止执政党从人民公仆变成“老爷”的问题，即走出黄炎培老先生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问题。但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夸大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超越了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因而选择了错误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途径。与此同时，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未能在事前、事中阻止这样的错误，可能是文革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文革之后，未能深刻总结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改正错误的完整、准确的措施，已经造成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失误。照此发展，将会给中华民族的继续发展带来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也会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带来更加严重的挑战。

文革是党和国家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我们必须永远防止文革或类似文革的事件在中国重演。

但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防止党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问题的确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有解决，随着执政，在实践上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暴富利益集团的出现；工农大众的相对贫困化；道德的全面沦丧；“沉渣的严重泛起”，以及在经济建设中出现资源的严重破坏、环境的不断恶化等等事实，正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不能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办法去解决，但应当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是急需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予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花大力气研究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研究执政党的建设，包括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恢复党的信仰和宗旨，将其变成行动；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威力；全心全意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实践的检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党内的蛀虫清除出去，重新赢得中国广大

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这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方向。

注：

- 1、本文作者都是当年清华大学文革的亲历者。
- 2、达瓦次仁，男，藏族，12·25 战团核心组后期成员。2001 年 11 月他曾明确表示应当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留下来。几个月后，他因病去世。达瓦次仁同志也是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为此，我们也将他的名字署上。

【文摘】

清华大学两派之外的第三种势力

孙怒涛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所著《良知的拷问》一书第二十四节，原题为“两派之外，清华的第三种势力”。

在团、四两大派政治势力之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弱小的第三种势力。这其中大致有两部分：逍遥派和中间派。

在文革开始，是保蒋（南翔）还是反蒋，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同情蒯大富，在“是”与“否”之间举棋不定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参加文革的态度都是很积极的。那一阶段，几乎没有什么逍遥派。

后来，因为支持工作组、参加“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八九”派在与批判工作组、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八八”派的争斗中落败以后，不少“八九”派的人，还有一部分出身“黑五类”的以及父母被冲击的干部子弟，开始不再积极参与运动而趋于消极旁观，安于逍遥。逍遥派中有些人借大串联之机免费乘车住宿的优惠条件游山玩水，有些人借串联之名行“并联”（即男女朋友并肩一起出去周游全国）之实。也有不少对熙熙攘攘的大字报大辩论不感兴趣，躲在某个角落里背外文的，或在宿舍里堂而皇之搞“线路斗争”（对焊装半导体收音机的戏称）的。

随着运动无尽头地拖延下去，这一支逍遥派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文革的厌倦情绪在加深。逍遥派们各自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共同的一点是这些事情大都与文革无关。他们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文革、抵制文革。党团组织的瘫痪给了这些逍遥派以足够的生存空间。

中间派往往是既不同意团派的观点又不赞成 414 的观点，有点无所适从，于是就游离于两个主流派中间。即使观点上有偏向团派或 414 派的，有的甚至也偶尔参加团派或 414 派的活动，但是都不十分积极。不过，他们又与逍遥派不同，他们都比较关心学校的运动。

逍遥派也好，中间派也好，由于没有组织团体或者团体不够强大，所以既发

不出响亮的声音，又显示不出雄壮的力量。他们在清华文革的舞台上是被边缘化的，还算不上是一支与团派、414并雄鼎力的第三种势力。

在“414串联会”成立之后的5月初，以栾德富为首的“五七串联会”成立。它的宗旨是反对派性，促进联合。栾德富是温和的老团，他既反414的派性，也不留情面地反团派的派性。但是“五七串联会”未能制止414的分裂。后来，栾德富参加了414，“五七串联会”也随之解体。不管怎么说，“五七串联会”可以算是一支代表了中间派的第三种势力。

段云富（6字班学生）、魏洪波（电机系教师）都曾经是414的总部委员。在总部里，因为常常与“东方红战团”的某些人观点不一致，感觉很压抑，就不再常参加总部会议了。但他们对运动非常关心，并没有逍遥或消极。1967年9月底，团、四两派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联合总部”。这是一次貌合神离的联合，两个总部的各自机构仍然在独立地运转。这期间，经过批周泉缨、414战歌事件，两派关系实际上已经倒退到联合之前的状态。段云富、魏洪波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两派又将公开分裂之际，于1967年12月25日成立了“清华井冈山联合总部12·25战团”。他们的宗旨是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进行“斗批改”。他们宣称“12·25战团”既不属于团派，也不属于414派，是属于“联合总部”的。他们的成员，不问是老团还是老四，只要是反派性、反武斗、促联合的就行。“12·25战团”是继“五七串联会”以后的又一支代表中间派的第三种势力。而且，它的影响比“五七串联会”更大，存续时间也更长。很遗憾，“12·25战团”成立不到十天，两派爆发了1·4武斗。成立以后四个月，爆发了百日武斗。“12·25战团”也未能阻止武斗的爆发。

我与栾德富相识，彼此是朋友。我与段云富、魏洪波更熟悉，在414总部里，是观点相近的同僚。尤其与段云富的关系更好一些。他领导的“巴黎公社”曾是“天安门纵队”的重要成员。

从观点上说，如果说我在1967年的5月份的时候根本就听不进“五七串联会”的话，那么到1967年年底、1968年年初，我对“12·25战团”的话已经听得进了。虽然在派性如何产生，分裂如何造成等方面，我的看法与他们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但是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等主张，我是完全赞同的。

我很同情段云富他们，觉得他们反派性促联合的宗旨和目标都是对的，心地是善良的，愿望是美好的，那种不懈努力的精神也是非常令我钦佩的。但是我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414头头的身份和比较强的派性，我不可能公开参加“12·25战团”。另一方面，我认为他们的主观愿望虽然很美好，但是没有抓住派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实质，仅单纯地反对派性，除了失望以外，不会有良好的实际效果。

所以，我仅仅是同情他们，并没有对他们有切实的支持和帮助。当然，我也不会去批评、嘲笑他们，更不会刁难、打压他们。

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这一口号深得清华绝大多数师

生员工的共鸣和支持。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大方向比团派和 414 都更正确些。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1、派性只是表象，指导文革的理论必然导致两派的产生，导致两派的分裂，导致派性的发作。派性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北京市革委会组织了封闭的以消除派性为目标的高校学习班，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12·25 战团”的权威性、政治能量和影响力是无法与北京市革委会相比的，那么，它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2、那个年代是以走极端为最革命、最坚定、最勇敢的。反对 414 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坚决不妥协的，在团派里面被称为铁杆老团，最吃香。同样，反对团派极左路线最坚决不示弱的，在 414 里叫铁杆老四，也是最被看重的。掌握团派话语权的最坚定分子与控制了 414 大局的最坚定分子，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性而不是派性，都认为自己在最坚定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认为只有自己这派才是左派，对方是右派或极左派，认为只有自己这派掌权才是代表无产阶级掌权。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占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少数，但是政治能量极大。有这两极存在，作为代表中间群众、代表全校大多数师生员工心声的第三种势力，与其相比，政治能量实在太小了，处于无关轻重的地位。

打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抗战胜利后，尽管全中国民众要和平，反内战。但是国共两党却互不相让。民主党派的声音反映了民意，促成了重庆和谈，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防止内战的全面爆发。其根本原因，民主党派既不明白国共两党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根源所在，自身的政治能量又太渺小了，构不成举足轻重的分量。

尽管“五七串联会”、“12·25 战团”在两派恶斗期间发挥的实际效果很有限，但是，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积极地顽强地发出反对派性、反对武斗、反对内战、要求联合的“第三种声音”，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沉默的大多数都能像他们那样发出吼声，他们的队伍强大到足以对两派起到牵制、调解的重要作用，甚至能影响运动的走向，那么清华的文革就可能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史林一叶】

重庆大武斗中的“第三条道路”

何 蜀

说明：本篇原系《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 年 8 月香港第一版）第九章中的一节，此次按新了解到的一些材料作了修订、补充。

当文化大革命演变成“武化大革命”之后，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文革舞台上的角色重新定位。一些原来不大知名的组织在武斗中因敢打敢拼而名声大振，另一些原来颇有名气的组织在武斗中被打垮或遭受重创而名存实亡，有的则在迷惘中

沉寂下去。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的走上了“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重庆大武斗中，就出现了这样几个值得研究的例子。

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与《战恶风》小报

重庆工人造反军（全称为“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本是工人造反军几大山头中最大的一个山头，后来因为他们比较注意“政策和策略”，影响逐渐逊色于以黄廉为首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在两大派大规模武斗中，以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蒋国志、李方成为代表的一批人，明确采取了拒绝参加武斗的立场。

蒋国志本身就是生产步枪的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的工人，也是该厂最早起来造反的人员，而反到底派主要头头中的周应古就曾与他一起在重庆市第六中学内参与造反串联和筹建工人造反军。这时周应古是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反到底派从1967年7月底开始决定将建设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向基层组织发放，实行“发枪自卫”。发枪开始后，周应古通知了蒋国志派人前去领枪，但蒋国志和李方成商议后，一致决定不参加武斗，因此没有派人去领枪——而工人造反军总部却因黄廉本人缺乏诚信及“组织不纯”等原因未被列入发枪范围，最后是黄廉动了些脑筋才骗领到一些枪支。

更值得一提的是，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为宣传他们反对武斗的观点，主办了一份《战恶风》小报。这份小报的几位主笔兼编辑，说来很有意思，他们是分属于敌对的反到底派和八一五派的五个人——

李方成，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天原化工厂干部，转业军人。

吕朝琛，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宣传部工作人员，天原化工厂工人。

苏汉，重庆铁铸管厂基建科干部，转业军人。未参加群众组织，倾向于八一五派观点。

曾庆余，重庆铁铸管厂四级翻砂工，八一五派成员。

冯炼，重庆铁铸管厂助理技术员（文革前夕刚从工业学校毕业分配进厂），八一五派成员。

其中，苏汉年龄最大，四十多岁，冯炼年龄最小，只有二十一岁。

他们这几位分属敌对派别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来的呢？原来，李方成和吕朝琛文革前都是天原化工厂的业余文学创作组成员，在市文联编辑熊小凡指导下进行文学创作学习；曾庆余和冯炼也是文学爱好者，冯炼在文革前夕还曾给《四川文学》投过一篇散文稿，因文革爆发，《四川文学》停刊，稿件被退回。苏汉是书法爱好者（《战恶风》小报的刊名就是他题写的），他与李方成文革前就是老朋友。

大规模武斗开始后，位于江北区的铁铸管厂及周边地区成为反到底派占领区，曾庆余和冯炼随厂里八一五派撤出，先到了城里两路口的市机械局（八一五派控制的单位），八一五派组织要他们去拿枪参加“文攻武卫”，但他们不愿参加武斗，就到苏汉家去躲避。当时苏汉之妻在重庆市公安局刑侦处工作，苏家住在

城里临江门大井巷公安局宿舍。在武斗期间，公安局宿舍是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在七星岗金汤街15号（一处教会房屋，“破四旧”后教会停止活动），距大井巷公安局宿舍不远，李方成也常带着吕朝琛到苏汉家去玩。这样，五个人在聊天中，发现不但都有文艺方面的共同爱好，而且对时局也有共同的想法，都认为武斗不管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错误的。几个人谈得十分投机，便决定把有关看法写成文章宣传出去。于是决定以工人造反军司令部的名义办了《战恶风》小报。取这个名字，一是选自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所谓“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中的“乐在天涯战恶风”（后来才知道是陈明远所作诗），同时寓含着认为武斗是一股“恶风”的意思。

小报办起来后，李方成去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找到五十四军文化处长郝子义，郝子义已经了解造反军司令部当时的观点，表示支持，安排他们的小报在重庆市印制一厂排印。

1967年8月8日，震惊世人的重庆“八八海战”爆发：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以三艘改装“炮艇”组成的武装“舰队”，从长江下游望江机器厂（生产高射炮的大型军工企业）出发，溯江而上驶往杨家坪的建设机床厂（生产步枪的大型军工企业），一方面为被围困在那里的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一方面去以高射炮（武斗中用来向对方武斗队阵地及进攻人群平射）换取半自动步枪。“舰队”沿途与在长江边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长江电工厂（生产子弹的大型军工企业）等地的八一五派武斗队交火。《战恶风》创刊号就在这一天，在搅得全城人心惶惶的激烈炮火声中诞生了。创刊号发表了呼吁两派“斗私批修”实现大联合的社论，刊登了造反军司令部关于停止武斗的声明。该报第二期于9月6日出版，发表了造反军司令部于武斗炮火正炽的8月27日呼吁两大派迅速停止武斗，组织力量下乡抢收、抢种的紧急呼吁和要求其下属组织下乡支持农业“双抢”的《特急命令》（其实这个所谓“命令”是虚张声势的广告，当时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召集不起什么下属成员组织了）。这期小报上的文章还公开表明了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怕来自左、右两边的攻击，不怕被说成是“右”了、“修”了；反对“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唯观点论”等见解。在一篇小品文《关于烈士的争论》中，他们借一个参与争论的青年之口，对武斗中身亡的人算不算“烈士”发表了这样的议论：

“所谓烈士，是那些在国内、外战场上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了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被国内、外阶级敌人杀害了的同志。像现在这样打‘内战’死了算什么烈士？如果八·一五派的战士算烈士，那么反到底派就是打死‘烈士’的阶级敌人，是反革命；相反亦然。……党中央制定出的‘红五条’指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所以，两派彼此都不是阶级敌人，而是阶级兄弟；他们互相武斗死了，是无所谓烈士不烈士的，只能说他们是上了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坐山观虎斗’的当而不自知冤枉死去的人；如果要叫他们什么‘士’的话，只能叫‘上当士’、‘受骗士’、‘冤士’。”

能够在当时那样几乎是“全民发疯”的狂热气氛下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很不

容易的。在武斗最厉害的时间里，两派几乎每天都会在不同地方召开“烈士追悼会”，不但两派群众会义愤填膺，发誓要“继承烈士遗志”，甚至死者家属（有的是父母，有的是兄弟姐妹）也常常会到追悼会上去慷慨陈词，认为他们“英勇牺牲”的亲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在这样的时候站出来说那些“烈士”只是“冤士”，岂不会遭到众人反感甚至唾骂？

因此，当《战恶风》小报出版后，造反军司令部还接到过外面打来的指责和威胁电话。即使在造反军司令部内部，也有一些人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以司令部主要“笔杆子”潘桂林为代表的一批人员，就脱离了司令部，而长期与造反军一支队住在一起。

不过，几位《战恶风》的作者兼编辑，也看到他们从七星岗到解放碑一带马路边贴出去的小报上有不少赞同者的批语，说明市民中还是有不少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这很使他们感到欣慰。

《战恶风》小报的独特观点还引起了当时重庆驻军领导人的注意。尽管重庆驻军领导人的态度是明显偏向八一五派的，但他们也不希望看到重庆局势长时间陷于武斗动乱之中，希望能安定下来让文革走上“正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五十四军政委蓝亦农和副军长白斌，还专门接见了《战恶风》编辑部的五人，听取他们的意见，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但是，在当时两派严重对立、社会思潮极端左倾的形势下，《战恶风》这样想走“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做法，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只印了两期过后，就没人敢再给他们排印报纸了。他们几个人又与造反军司令部负责人蒋国志一起到成都，打算另找地方排印小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联系成功。小报就这样夭折了。

在武斗中坚持走“第三条道路”的重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在1968年夏四川省、重庆市革委会成立后，最早意识到群众组织使命的终结，率先成立了善后工作组，着手解散组织，遣返人员。

八一五派工人组织内的“申平路线”

1967年重庆大武斗在中央下达“九五命令”之后暂时停息了，八一五派内部却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当时，与反到底派的工总司（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相对应，八一五派有一个工总部（重庆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工总部主要负责人是重庆机电公司的业务员申平。申平当时认为重庆的两派武斗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关，而这“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则主要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影响，因此他提出：重庆的文革不应由大学生（指重大八一五）主导，而应该像上海那样由工人组织左右局势。以申平、伍子明（重庆搬运装卸公司石桥铺汽车修理厂工人）为首的工总部常委就创办了《重庆工人》报，伍子明为主编。这个小报于1967年10月15日创刊，创刊号发表了呼吁坚决执行“斗私批修”方针、促进两派大联合的社论，只字不提当时重大八一五要求八一五派全面展开的“打刘、

张”（打倒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人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而是按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中有关“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等精神，只提大方向，不提派性观点，不提这派那派，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

《重庆工人》创刊号的问世引起了八一五派领导层一些人的极度不满，认为是“办成了《人民日报》”、“右了”，担心工总部也会像反到底派的工人造反军司令部那样走“第三条道路”。1967年11月3号，八一五派革联会在沙坪坝区工人俱乐部礼堂召开了全委会，各大组织头头数百人参加，以“反右倾”的名义，统一思想，围攻申平。

在会上，申平据理力争，坚持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认为省革筹刘、张有错误，但他们是中央“红十条”任命的干部，应该整理材料向中央汇报，由中央处理，不应公开发动群众来打倒，重庆两大派应按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有关大联合指示办事。由于这个会议经过周家瑜等有计划有组织的准备，因此对所谓“申平路线”进行了火力很强的批判，工总部常委中一些本来赞同申平观点的人也在强大压力下站到了批判申平一边或不敢再表示不同意见。最后，申平的工总部负责人职务被撤销。在争论中坚决站在申平一边的工总部常委、《重庆工人》报主编伍子明，在为“申平路线”作辩护时，还遭到一位革联会常委当众殴打，会议不欢而散。

随后，更换了领导的八一五工总部在重庆海员俱乐部召开了整顿领导班子会议，正式调整了领导班子，并作出了《关于〈重庆工人〉报错误问题的决定》。

事后，所谓“申平路线”继续遭到批判和清查，连八一五派的文攻武卫总司令、革联会常委阳增泰（军工系统朝阳电机厂调度员）也遭到了怀疑，因阳增泰与申平关系较好，也赞同应该由工人组织左右局势的观点，就被恶意制造出阳增泰走“申平路线”、“明保暗砸”（明里是保革联会的八一五派，暗中是砸革联会的反到底派）的谣言，阳增泰担任总负责人的军工系统八一五派组织八一兵团总部，还不得不组织专人对有关谣言进行了调查，最后得出并无其事的结论。但是，在1968年初中央组织重庆两派头头到北京学习班筹备大联合、三结合时，申平和阳增泰都被八一五派排斥于学习班之外。在学习班里两派各自推选进入四川省和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人选时，阳增泰这样大名鼎鼎的八一五派主要头头、产业工人代表，还被编造出“武斗中有杀俘嫌疑”的问题而被取消了推选资格。后来查明这又是恶意编造的谎言。

文艺界造反派的“第三条道路”

重庆文艺界两大派中的一些人员，在对武斗和相互攻击打派仗都感到厌倦之后，也想走一条“中间路线”。

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次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即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转发了《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强调了不能用“五十天”（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

害)包庇“十七年”和“三十年代”(执行过“文艺黑线”)的问题。重庆文艺界两大派中的一些人在江青这个讲话的启发下,组织了一个“冲黑派”,公开宣称自己既不是八一五派,也不是反到底派,而是只抓“大方向”,专门批判、冲击“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冲黑派”。“冲黑派”中比较活跃的一位负责人邹雨林,是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的文学辅导干部,转业军人,文艺界的“老造反”,曾任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常委,1967年4月在“砸烂革联会”风潮中拉出人马组建了文艺界红一方面军(以后归并于反到底派文艺界延安兵团)。后因反对武斗,被反到底派认为“右倾”而下台。

一份印发于1968年1月19日,署名“重庆艺术馆《中流击水》记者”的油印传单,介绍了他们的组成情况:

形式:一、分别从文艺界两派中“杀”出来,成立独立自主的新组织,退出原来的战斗队(如话剧团《追穷寇》);二、分别从两派中站出来,参加新组织的活动,不退出原来的战斗队(如歌舞剧团《无产者》);三、从某一派中“杀”出来(如艺术馆《中流击水》)或站出来(如歌舞剧团《斗批文艺黑线联络组》、川一团815《11·12》)。

这支新文艺队伍的成员中,有“文艺司”的常委,部分文艺单位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勤务员和部分815、反到底的战士……

当有人指责他们走“第三条道路”,是“第三种势力”时,他们理直气壮地辩称:第三国际、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都是“第三”,“第三”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印发传单,写大字报,在闹市区组织设立了大批判专栏,力图引导更多的人脱离两派斗争,“掌握斗争大方向”,但是他们没有建立起正式的组织,对所谓“文艺黑线”的批判也引不起广大群众兴趣,响应者寥寥,只活动了不长的时间。

何况,他们在拥护文革的大前提下所抓的“大方向”,即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也并无多少“正确”可言,甚至有可能“大方向”抓得越好,对历史犯下的罪过反而会越严重。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们不可能超越的局限。

2013年6月19日于重庆风江阁

【史实考订】

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印章及所谓“清华附中模式”

卜伟华

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几种不同印章

原来我的印象里,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两个印章,在我保存的一些清华附中文革资料上盖有这两种印章。

一为印面为 10 个字的“北京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印章，一为印面为 11 个字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印章。

第一枚印章的来历，源自于清华附中曾经改名为红卫兵战校。

1966 年 8 月下旬，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改名的确切时间是 8 月 27 日。这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一文，首次使用了“红卫兵战校”的名称。《人民日报》8 月 28 日第 2 版刊登图片，介绍清华附中红卫兵到北京街头宣传“十六条”的情况，还没有使用红卫兵战校的名称。8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刊登新华社记者拍摄的介绍清华附中红卫兵学习“十六条”的照片，其文字说明是：“红卫兵战校（原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认真学习讨论十六条，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



这枚印章上，北京红卫兵战校这 7 个字是仿宋体，红卫兵 3 字则是仿毛体，其中的卫字是繁体字。这枚印章的直径约 4 厘米。这枚印章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一位当年预 651 班学生手里，在我写作此文的前几天，我请他将这枚印章的图片传给了我（见左图）。

我保存的一本《挑战报》合订本上盖有这枚印章。《挑战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 1967 年 8 月至 11 月编辑油印的一份小报。其中 11 月 8 日的一篇文章《评最近一时期教育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方向》，矛头直指《人民日报》，当时在北京引起不小的反响，致使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跑到清华附中来讲过话。这本《挑战报》合订本原来是准备在一次“首长接见”时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在《挑战报》合订本的扉页上写有这样的文字：

“献给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最最敬爱的周总理及中央文革首长。红卫兵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红小兵
清华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的字样。



后来这次接见因故取消了，于是这个合订本就保留下来了。

北京红卫兵战校红卫兵的印章一直使用到 1967 年底。上述《挑战报》合订本盖上印章的时间就是 1967 年 12 月。1968 年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刻制了印面文字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印章。这枚印章上，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这 8 个字是仿宋体，红卫兵 3 字也是仿毛体。印章直径约 4.5 厘米。

1968 年，中学生们都陆陆续续上山下乡各奔他方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给每位成员发了一本红卫兵证，作为纪念。红卫兵证上盖的就是这枚印章（见左图）。



在当年那种混乱无序的状况里，刻制印章并不需要严格的手续，刻制一枚红卫兵组织的印章可能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文革结束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到朋友王云生家去玩。王云生是我校高 654 班的学生，当年曾为该班红卫兵核心小组组长。他的一

本文革期间的日记本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个日记本的扉页上，盖有一个红卫兵印章，印面上的文字是：首都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共 10 个字。首都红卫兵战校这 7 个字是仿宋体，红卫兵 3 字则与前两枚印章一样是仿毛体。这枚印章的直径也是 4.5 厘米。（见下右图）

这枚印章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在我的追问下，他道出了其中的秘密：1966 年 8 月底，他从外地串连回北京后，得知学校已改名为红卫兵战校，他想，这个红卫兵战校能存在多长时间呢？应该为这个红卫兵战校留个纪念。于是他私自到新街口一家刻字店刻了这枚印章。据他说，这枚印章只在他自己的日记本上盖过，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用过。



前几年看到王友琴写的文章《记陈彦荣之死》，才知道清华附中陈书祥老师的父亲陈彦荣就死于“破四旧”的高潮中。他是被北大附中的学生抓去殴打致死的。对陈彦荣之死，我感到震惊和愤怒。王友琴通过大量的采访，记述了许多文革受难者的悲惨事迹。我同意王友琴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而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部分。”

王友琴在《记陈彦荣之死》一文中附了一张不太清晰的图片，是一张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印章的介绍信。看到这张介绍信上的红卫兵印章，我开始有些怀疑，因为与我记忆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印章完全不一样。去年夏天，我找到陈书祥老师，请他亲自介绍有关情况。陈老师向我出示了他保存了 46 年的那张介绍信，

并详细向我讲述了有关情况。我认真听取了陈老师的介绍，并将那张介绍信拍照留存。

当年陈书祥知道自己父亲被北大附中学生打死了以后，就到清华附中革委会去开介绍信，以便取回父亲的遗体。当天在革委会值班的是革委会委员阎阳生，阎阳生是预 652 班的学生，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他了解情况后，立即给陈开了介绍信。介绍信的全文如下：

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

我校陈书祥到你校接洽其父事（已死），请让他取回尸体，按政策给以适当处理。

此致

敬礼

清华附中红卫兵 1966. 8. 29

介绍信是写在一张边上有四个圆孔的活页纸上的，所盖红卫兵印章印面上共 7 个字：清华附中红卫兵，7 个字都是仿宋体，红卫兵三字略大一些。印章直径约为 3.5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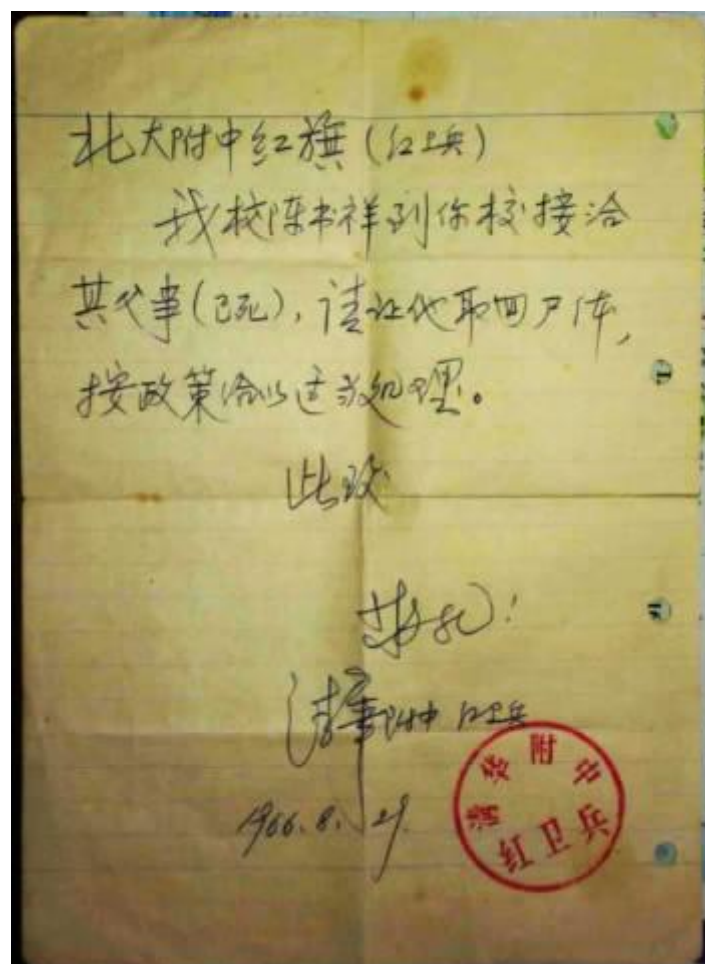
陈老师说：“阎阳生一点也没有为难我，听我讲了事情原委后马上就给我开了介绍信。”

但是，当天陈老师到北大附中后，听说他父亲的尸体已经被拉走了，于是他并没有进入北大附中校园，他把这张介绍信保存下来了。

陈老师对当年的事情讲述得非常清楚，父亲的无辜死亡对他来说确实是刻骨铭心的。

听了陈老师的叙述，我当时就打消了对这枚清华附中红卫兵印章的怀疑。可以肯定，这枚印章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第一枚印章。据知情者介绍，这枚印章的刻制和启用时间不会早于 1966 年 8 月，这应当是在工作组撤出之后的事情。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后，这枚印章即不再使用。也就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第一枚印章的使用时间也就是一个月左右。

王友琴《记陈彦荣之死》一文，记述了陈彦荣这名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死亡，是有意义的。但其中对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印章的介绍信的描



述却不准确。王友琴在文章中说：“这张领尸体的证明信写在一张有三个小洞的活页纸上。当时红卫兵没有专用信笺，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图章。茶杯口大的红色圆印子赫然于纸上。”

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介绍信是写在边上有四个圆孔而不是三个圆孔的活页纸上的，这至少说明王友琴的文字不严谨而具有随意性。所谓“茶杯口大的红色圆印子赫然于纸上”，是一种文学性的描写，可能是想形容印章之大，但杯口直径 3.5 厘米的茶杯确实并不能算大。

王友琴文章中说：“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出处理死尸的‘证明信’，写上年月日，盖上红卫兵的图章，一付处理一桩例行公事的样子。从行文口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把打死一个人当作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们的一个老师的父亲被另一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对他们好像是一件普通公事。”这样的描写，与我听到的陈书祥老师所叙述的情景和感受不符，显然是以作者自己的想象代替了客观记述。

二、清华附中红卫兵对打人风的反对

1966 年 7 月底，工作组撤出学校后，北京文革中的暴力行为就普遍增加。8 月下旬以后，伴随着“破四旧”的兴起，更是陡然升级。在清华附中校园内，也出现了多起打人事件。不可否认，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员中，也普遍受到“血统论”的影响，在对待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偏见。这种情况，从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小组的文章《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一文中可见一斑。但是，从总体来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打人问题上始终是旗帜鲜明地一贯反对的。

1966 年 8 月 6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北航附中、人大附中的红卫兵一起，发表了表明反对打人立场的《紧急呼吁书》。呼吁“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要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载于清华附中红卫兵 1966 年 9 月编印的红卫兵大字报选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看后，认为《紧急呼吁书》切中时弊，写得很好，当即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恩来同意并报毛泽东圈阅。后来这个《紧急呼吁书》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在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散发，并作为不编号的文件印发给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员。但这个《紧急呼吁书》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会议印发的文件也被正式通知收回（详情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第 338-339 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版）。

8 月 27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以“红卫兵战校红卫兵”的名义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其中特别强调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文章写道：“打人，不利于争取团结广大中间群众，反而引起他们的恐慌，使他们脱离我们，脱离改造，脱离革命。打人，不利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有许多坏分子乘机起哄，乱

打一通。打伤我们的同志，破坏我们的运动，我们要谨防这些坏分子从中渔利。我们红卫兵应该谦虚谨慎，讲道理，尊重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专横跋扈，蛮不讲理，老虎屁股摸不得，草菅人命，把人打死，听到不同意见就暴跳如雷，就动手打人。那样做，是国民党法西斯作风，是恶霸的作风；决不是真正的红卫兵红五类！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要最勇敢地捍卫十六条，捍卫党的政策。现在是真正的红卫兵站出来的时候了！”当天，清华附中组织了五六百人进城，到北京街头各闹市区大张旗鼓地宣传“十六条”，散发《十点估计》。当时有《人民日报》记者随行，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上街宣传的照片。

《紧急呼吁书》和《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两篇文章当时在北京，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其中所表达的反对打人，反对“破四旧”中的极端行为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三、关于所谓“清华附中模式”

王友琴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作“清华附中模式”，并为此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文章将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文革中的作用概括为：为文革贡献了“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师和同学以及校外居民的样板”（王友琴《刘树华之死和清华附中红卫兵》，载于《文革博物馆通讯》第155期）。

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很片面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中打人和纵容打人的现象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否认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部分人是反对打人的，不能否认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打人风盛行的时候公开发表的几篇明确反对打人的文章所起到的较好的社会效果。

笔者作为当年清华附中的一名学生，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名成员，曾经写过《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和《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两篇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载于《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载于《中共党史资料》第80辑），提供了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和相关史料。需要指出的是，《刘树华之死和清华附中红卫兵》这篇文章存在不少史实上的硬伤，现列举如下：

1、文章说，1966年8月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卜大华主持了全校性的斗争会。事实上，当晚召开的斗争会并不是全校性的，主要是教职工参加，只有少量学生参加。卜大华并没有参加这个会。卜大华当晚在与其它几个人一起讨论、起草《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文章。

2、文章说，6月9日工作组进入学校。事实上，工作组是6月8日进校的。

3、文章说，“8·18”那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了50张上天安门城楼的票，是各中学里拿到票最多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在城楼上集体受到毛的接见，他们中和毛泽东握了手的人，以后几个星期没有洗手。”事实上，当天只是口头分配了各校上天安门的人数，并没有“票”。分给清华附中的名额是40名而不是50名，清华附中红卫兵实际上天安门的人数是26人。所谓“几个星期没有洗手”的事，在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里曾有所闻，但王友琴随意将这样的故事安

在清华附中身上，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编造和杜撰。有学者说过，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在王友琴的其它一些文章中，也经常能看到用讲故事代替历史研究的情况。

4、文章说，“8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全北京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事实上，8月24日12所中学到清华大学“造反”之事是清华大学而不是清华附中召集的（详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第43至47页；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29页；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第414页）。

5、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的新概念新名词。”事实上，“红五类”、“黑五类”的概念和名词是文革初期普遍流行的，具体是谁发明的现已难于考证。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它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身上，是毫无道理的，对一个历史学者来说，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是要不得的。

6、文章说，杨爱伦“在1966年7月底就开始在班里被红卫兵‘斗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详细指示如何整她。”事实上，经向杨所在的高652班同学了解，并无此事。

7、文章说，郭兰惠受到批斗后自杀，而且红卫兵告诉医院郭兰惠是右派学生，“于是，医院不加抢救，让郭兰惠躺在医院的地板上渐渐死去。”事实上，郭兰惠在自杀前并未受到过批斗，她自杀后，清华附中学委会派周春晓、申克美、王慧成三人去医院，要求医院全力抢救，医院也确实进行了抢救（卜大华《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香港中国书局有限公司，2011）。

8、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1966年11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到火车站殴打这些人。”我和我的许多清华附中同学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王友琴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9、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到了贵阳，殴打贵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们打了京剧团的演员，还把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的园长也揪来剪了‘阴阳头’，并且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和上一条一样，我和我的许多清华附中同学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王友琴同样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10、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家庭出身是加入红卫兵的唯一条件，红卫兵又是将此条件明文写在章程里的组织。”事实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并没有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相反，清华附中红卫兵明文规定：表现好的非“红五类”，以至“黑五类”、资产阶级的子女，也可以吸收入红卫兵（清华附中学委会、红卫兵《关于红卫兵组织的七个问答》，载于清华附中红卫兵1966年9月编印的红卫兵大字报选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实际上，清华附中红卫兵从成立到离开学校，始终都不是纯“红五类”的组织，总体上，非“红五类”的成员约占10%

左右。有些班的非“红五类”成员比例还要高一些，如我所在的初 634 班，非“红五类”的成员占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文章还提到了一个有关清华附中“井冈山”的事情。“井冈山”是一直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立的组织，但王友琴在对“井冈山”的一些事情的叙述上也采用了与对红卫兵的叙述基本类似的方法。文章说，清华附中武斗期间，“‘井冈山’为了证明他们的‘革命性’，把关在学校的五个‘牛鬼蛇神’——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语文老师高恬惠，职员张秀真和羊涤生，用布蒙上眼睛，拉到教学楼门口，命令他们往上爬，爬上五层楼，又爬上房顶。‘井冈山’的学生在楼顶上用皮鞋底抽打这五个人。”那几天，我本人也在学校，如果真有此等事情，应该是众所周知才对，但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知王友琴这样写的依据是什么。笔者在写作此文前两天，向当年“井冈山”的一位负责人问到是否有此事，也得到了断然否定的回答。

【蓦然回首】

武斗硝烟中的石桥铺场口

庞国义

重庆石桥铺地区，在明代属巴县之一“里”，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明清时期官府为便于驿道管理，在主要交通干线上 30 里设一铺，60 里设一驿，这里便是从重庆城区南纪门通往成都“中大道”的“首铺”。

资料显示，1950 年石桥铺的非农业人口有 630 户，2460 人，文革前夕估计已达 2000 来户近万人。街道狭长，地势东北高，西南低，长约 1.5 公里，宽 5 米，青石板路面，两旁多为土墙筑壁的瓦房或草房，只有极少量的一楼一底砖瓦房。街道四周绿地环绕，是石桥公社的垭口、山林、张坪、白鹤林、柳背桥等生产队的土地。

1946 年我家从长江边的黄沙溪搬到石桥铺定居，住在街道东北面左侧第二间瓦房，因石桥铺曾经名叫“石龙场”，人们习惯把我们那一截街称之为“场口”。

我们场口比邻而居的二十来户平民，大多是从民国时期过来的小商小贩，属于“第三产业”的服务性人员，讲究勤勉持家，和气生财，每天的生活规律如同农民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家家相互间知根知底，低头不见抬头见，虽然中共执政以来经过了数次政治运动风浪，但街坊邻居们依然相处和睦，互助互敬，尊老爱幼，民风厚道淳朴。

距场口几十米处就是公路十字口，四个方向的公路分别通往大坪、杨家坪、沙坪坝、新桥，距离均在八公里范围内，整条街道其实就夹在通往沙坪坝和新桥的公路之间。

这样适中的地理交通位置，在正常年间给我们出行以极大方便，但在文革武斗动乱期间却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这里处于武斗中心位置边缘地带，无

时无刻不感受到武斗威胁。原想本本分分过太平日子的平民百姓，被打乱了正常生活秩序，在炮火硝烟之下演绎出一幕幕伤心悲剧。

枪声第一次在场口爆响

1967年，重庆的文化革命演变成“武化革命”，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惊慌和恐惧，看见山城武斗之风蔓延，遍地烽烟，感到朝不保夕，真不知这样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7月，人们传闻嘉陵江桥头和化龙桥虎头岩发生了动用枪支的武斗，打死打伤了不少人，居民们更加人心惶惶，经常一堆一堆地聚在场口议论纷纷，交谈所见所闻，只要看见有人上街回来，就拦住询问打听外面的武斗进展情况。

7月末的一个中午，天气晴朗，快12点了，我在土墙外用木板搭建的“偏偏”厨房“跳锅边舞”，手中忙碌操作，嘴里哼着当时流行的歌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准备给即将下班回家的父母煮饭。

淘好的米刚倒进烧开了水的锅里，就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声源仿佛就在身边，如此近的距离，使我大吃一惊，脑筋飞速运转：“武斗搞到我们这儿来了吗？子弹落在哪里？目标是谁……”

来不及进一步思索，瞬间一连串枪声炸开了花！事发突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那清脆焦躁的声音在脑门前乒乒乓乓炒豆似地爆响，震得我脑袋发懵，双手直抖，两腿打颤，家中读一年级正在桌上写字画画的小幺妹“哇”地发出了尖声哭叫。

我大叫一声：“危险！”这四壁用薄木板拼凑的简易厨房遇到子弹肯定是“对穿对过”，便急忙把锅盖朝锅上一扣，扔下锅铲就向土墙堂屋奔去。小幺妹躲到了床上，我慌乱中抓起一床薄被子塞给她，她像鸵鸟似地将被子裹住头，不停地“筛糠”。

密密麻麻的枪声中，门“咣”地一下被撞开，接二连三地滚进三个人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外屋居住的健壮强悍的高嬢嬢，拖着她的一双儿子（一个读小学六年级一个刚“发蒙”）冲进了我们屋内。

在突如其来的枪声中，高嬢嬢一改平日威严常态，表现得那么虚弱胆小，母子三人惊叫着，用一种非常奇特的姿式，连滚带爬地从连接我们两家的巷子通道跌滚进我家后，直梭梭地钻进堂屋中的八仙桌下，浑身颤抖挤成一团，大人不断嗫嚅“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小孩发出哇哇哭声，我也受到感染，不由得把腿朝下蹲，似乎身体矮一截就不会被子弹击中。

前后不到一分钟，枪响声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彻底消失了。

母子三人爬出桌底，怏怏地站起来，神态好像还有点埋怨我全景窥视了他们刚才的狼狈相，既紧张又不好意思，连一句“道谢”声都没有，高嬢嬢便拖着一双儿子的手返回巷道去了。

原来枪声爆响的那一刻，他们一家正站在巷道吃午饭，手中的饭碗被吓得齐

刷刷地掉在地上摔破了，米饭汤菜铺洒满地，一片狼藉。

高嬢嬢出去后没有立刻拾掇地上的破碗残渣，打扫劫后痕迹，却先去屋里给小儿子找了一条裤子换上一——因为那小儿子被吓得流了尿。

这时我大叫一声“糟糕”，连忙冲进厨房，只见里面一片乌烟瘴气，沸腾的米汤水早已溢出锅外，把锅下燃烧的蜂窝煤淋熄了，煤炭灰混合着水蒸气在狭小的空间弥漫，烟雾腾腾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抓起锅盖，用锅铲在锅里搅了一下，沮丧地骂道：“吃饭，还吃个铲铲呀！”

“脱险”后的众街坊纷纷走出房屋聚在场口，七嘴八舌地议论刚才的险情和感受，原来“大哥莫说二哥”，各家各人的表现都差不多一样狼狈。街中间过来一个人，说供销社营业员老邓最惨，当时他站在凳子上踮起脚取货架上的东西，枪响时被吓得摔下来跌在酱油缸子上，头部和腰杆都受了伤，正要送到重医去看病。

隔壁的“矮哥”是唯一的现场目击者。他说，枪响时他正在电车保养厂旁边的山坡上站起耍，看见一辆从杨家坪开过来的卡车上，有十几个学生娃儿嘻嘻哈哈地朝天鸣枪，全部是崭新的“半自动”，他吓得就地趴在草笼笼里躲了起来，直到车子朝沙坪坝方向开了很远，听不见枪响了才爬起来，他还坚定地断言：“肯定是从建设厂搞的枪！”

到农村躲武斗

8月份，天气闷热无比，真枪真炮的武斗也随气候进入燥热高潮，山城的各个角落响起密密麻麻的枪炮声。

杨家坪、大坪、潘家坪地区两派聚集数千人，不停息地开展大规模集群作战，每天火力交叉，枪炮隆隆，硝烟弥漫，打得天倾地斜，尸横遍野。

8月2、3号，场口的居民们看见杨家坪方向过来一串串年轻学生，也有部分满脸胡须的中青年工人，穿着军衣和劳保工装，身上脸上脏兮兮的，头发蓬乱，敞胸露怀，有的头上还缠着白色纱布，扛着步枪机枪，在我们惊诧的目光中，沿公路朝沙坪坝方向匆匆而去。

又过了几天，目睹公路上不时有一群群从杨家坪过来的人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逃难，说大坪杨家坪一带已经十室九空。

石桥铺当时行政区划属沙坪坝区，也是八一五派控制区域，石桥铺中学（文革中改名“燎原中学”，文革后一度改名为市58中、现为渝高中学）的燎原兵团和石桥铺民中（文革中改名“育新民中”，1972年合并到石桥铺中学）的育新纵队均系八一五派的铁杆组织。文革前夕刚迁入石桥铺的重庆外语学校（川外附中）的学生本来就不多，反到底派势单力薄，翻不起大浪。

场口距潘家坪、陈家坪五台山的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不时传来阵阵枪声。久而久之，人们渐渐习惯了，胆子大了起来，没有再像当初听见枪响那样反应强烈了。后来公路上经常看见往返于沙坪坝大本营方向的运兵车、弹药车、粮草车以及伤员急救车、运尸车匆匆驶过，也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了。

8月8号中午，听见“矮哥”在场口大声喊叫：“坦克！快点来看坦克哟！”场口各家各户的人纷纷端着饭碗跑去，挤在公路边，过去只在银幕上见过的两辆坦克从石杨路上驶来，到十字路口（当时路中间还没有修转盘）放缓了速度，好像有意让我们参观。

坦克上面各趴着一名穿短袖汗衫的青年工人，其中一个还是眼镜。大热天他们头顶钢盔，浑身裹满子弹袋，双手平端一把半自动步枪，一动不动作瞄准射击状，汗水顺着脸颊直往下淌。

看见坦克没有朝人群动武的打算，围观的人群胆子也壮了起来。“矮哥”仗着舅舅是造坦克的空压厂的工人，非常得意而肯定地回头对我们说：“是空压厂开出来的！”

他还大胆放肆地朝坦克喊叫：“打一炮来看噻！”旁边一个人附和道：“光示威嗦？”

坦克没有理会路旁人们的喊叫，继续朝沙坪坝方向隆隆前行，柏油路面留下深深的履带齿印。

看见这些现代化兵器耀武扬威、气势汹汹的模样，我不禁心惊肉跳：不知这场战争会怎样发展，后果会怎样？

文革初我曾参加过重庆二中东方红战斗团（官办保守派的“赤卫军”系列），在1966年大田湾发生“一二·四”事件，保守派遭到重挫后，就回家闲耍，读初三的弟弟是燎原兵团战士，热兵器战争开始后也在家闲起。虽然我们当年都处于“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期，在老实巴交的父母严厉管教下，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建国后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父亲一向谨小慎微，深信目前的动乱只是暂时现像，坚决不准我们参加武斗，他甚至断言：“这些搞武斗的崽儿二天都脱不到手！”

被称为“形势大好，乱了敌人”的那段日子，武斗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大，我家厨房周围经常落下流弹，薄木板壁上还被穿了两个洞眼。为躲避流弹，我们那条街的居民也学着杨家坪的平民百姓那样，开始四散逃离，投亲靠友。

8月中旬的一天，父亲急匆匆下班回来，说路上听到不少人传言：八一五派在五台山守不住了，反到底派将从杨家坪攻过来，到时年轻人都要被抓去审问，两句话说得不对头，就要遭枪毙。

虽然半信半疑，但凡事以谨慎为妙，父母决定叫最具危险威胁的我们哥俩，到石桥公社联芳大队（文革中更名为红岩公社曙光大队）斑竹林生产队的乡下二姨妈家里躲避一段时间。

于是我们两兄弟便一前一后抬上凉板，凉板上搁着一口袋大米（约有20来斤），沿着乡间小道，一路爬坡上坎到了离场口约三公里的农村二姨妈家。后来街上三姨妈家的一位读初二的表弟周洪文也赶来与我们会合，他用提兜带来十把干面。

二姨妈的住家在烟墩山山坳，紧邻的便是六店子大队（文革中改名“红岩大

队”)的六店子和长石坝生产队，与歇台子、潘家坪直线距离差不多也仅有三公里，只不过隔着一道山峦，看不见公路和两旁的房屋建筑，心理上稍觉安稳而已。

我们一行龟缩在农村土墙院子里吃稀饭凉面，白天以下象棋、看小人书打发无聊时光。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耐不住寂寞，为好奇心所驱使，由二姨妈家的表弟翁华云引路，悄悄爬上烟墩山，匍伏在山岗上的红苕地里，置蚊虫叮咬、鼠蛇袭击于不顾，遥看隆隆炮响的潘家坪地区夜战。

这里地势很高，身边一片昏黑，远远望见通往市区的大石路上灯光若明若暗，坦克履带在混凝土路面上碾压发出的巨大轰鸣声（当时大石路为混凝土路面，石杨路、石小路为柏油路面，石新路为碎石路面）震慑心扉。远处枪炮声不绝，方圆数公里的天空中各色曳光弹交织飞舞，弹道流光让人眼花缭乱，蔚为壮观。像是再现二战中攻克柏林的一组电影镜头，又像感受到父辈描述的日机轰炸重庆的恐怖场面，我恍惚间产生一种时光倒流之感。

家家都挖避弹坑

“九五命令”下达后，战事稍歇，我们得到消息后纷纷返家。刚一到家，就听说前几天中午，正街西南部街尾醪糟铺居住的一个7岁小女孩，在地上铺的凉板上睡午觉，不知哪里飞来的一颗子弹落进房屋，碰到家里一个什么硬物，拐了个弯落到小孩颈子上。由于小女孩流血过多，加之抢救不及时，她还未来得及全部看清这个慌乱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就不明不白地离去了。

居民们谁也不愿再离家出走避难了，大家便想办法采取防范措施，不知哪个带的头，场口的家家户户开始挖“防空洞”。挖防空洞对重庆人来说并不陌生，当年日寇对重庆实行大轰炸，国民政府和老百姓在街边、路旁、山岗、峭壁挖的上千个防空洞至今犹存，只不过这次是在自己家中，习惯上称为防空洞，实为“避弹坑”。

父亲带着我们因陋就简在家里靠墙的地面上挖出一个一米见方的土坑，半人深，用石灰将四壁和底部抹平，坑上边各摆一根长条凳，搭上凉板，平时在凉板上睡觉，一旦枪响，便翻身下床，钻进坑里或蹲或坐，防避流弹飞来伤人致命，继续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这个土坑在武斗结束后成为我家的储藏室，搁放米缸子、泡菜坛子等，一直到后来房屋被拆迁。

我为领取粮票差点丧命

我在化龙桥虎头岩下的市二中高中部住读，户口和粮食关系均在学校，因为停课，必须每月5号那天返校找伙食团长黄兴元老师领取粮票。由于武斗原因，担心路上的人身安全问题，我一般两个月去领一次。

从石桥铺正街到学校有两条路选择，一是乘公共汽车到河运校，下车后步行通过石油校、五一技校到虎头岩，这称为“大路”。二是从草房街（现在叫红育坡），顺长石坝，通过六店子到虎头岩，这是一条乡间小路。

我对当时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交战双方刚上缴了武器，慑于“九五命令”

余威，正处于休整观望阶段，暂时不会出现大的摩擦和武斗，于是决定走大路到校。

下车后顺石油路疾步前行。那段路上5、6月份使用冷兵器武斗时，用钢钎捅死人的痕迹早已没有了，而8月份用炸药炸裂的一幢邮电器材厂（515厂）的办公楼还歪歪斜斜地立在那里，无言地向路人叙说此处曾经爆发过一场恶战。

走过沉寂冷清的石油学校大门，拐弯路过五一技校岔路口，忽然从路边跳出几个手持半自动步枪的学生来，厉声喝道：“站住！哪里的？”

“二中的。”我简短回答。

“哪一派？”

“逍遥派。”

“妈的，你胡说！你娃肯定是工业校的！有证明没有？”两名学生端起步枪，枪尖上明晃晃的三角刺刀逼得我本能地后退一步。

工业校与二中毗邻，该校剽悍的“红岩兵团”是反到底派的一支劲旅。发生在该校的“七二五”事件，揭开了山城大规模使用军用常规武器进行热兵器战争的序幕。而二中两派参加武斗的人很少，大多数学生都远离武斗在家闲耍，不引人注目。

我知道五一校“第四野战军”是八一五派的武斗之花，但他们没有戴袖章，无法肯定他们就是“四野”的，就是戴上袖章也很难说是真是假，这年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事情多得很，一不小心回答成他们的对立派，会惹许多麻烦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我只得按照原来的思路坚持说道：“我原来是‘思想兵’的，思想兵垮了后就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了。”这样的回答最多只能挨几下枪托子。

一个学生上前来把我的衣服和裤子口袋搜了一遍，骂了一句“狗日的逍遥派，空包包，没得搞头”。另一个学生一边念叨：“逍遥派，逍遥派，运动后期当左派……”话音刚落，突然举起枪来，大喊一声：“杀！”三角刺刀刺向我来，我急得一个后仰翻倒在地，“哎哟哎哟”地叫了起来。几个崽儿乐得哈哈大笑。

正在危难之际，来了一个腰佩“五四式”手枪的家伙，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居然笑嘻嘻地说道：“对头，他是二中的，没有撒谎，放他走。”

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得到赦令，虽然感觉有点意外，但我还是翻身起来立即就走，身后听到那人给伙伴们解释说：“他跟我们班打过篮球的，他狗日的投篮很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我终于想起，文革前，我班篮球队曾到五一技工校与某班赛过一场篮球，当时我班队员发挥得出奇地好，特别是我，投篮一投一个准，他们输得口服心服，这名佩手枪的学生肯定是那场球赛的参与者。

过去我一直没有把他们看上眼，现在他们居然如此霸道，心里气愤难平：“妈的，风水轮流转。硬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呀！”

到校领了粮票后返家，我怕再次遇到“歹徒”搜包包，就把票面大的几张塞到解放鞋里，结果路上倒是顺利，哪知到家一看，上面那张崭新的10斤“重庆

市搭伙券”被踩得几乎看不出原样来，真是倒霉透顶！

后来父亲到粮店托熟人说好话，好不容易才用它买了米。那年月粮票珍贵得很，这次我虽然没有给家庭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但还是深刻检讨自己缺乏生活常识，差点酿成大祸。

12月那次领粮票，我再不敢走大路回校，只能走小路试试了。文革前我走在这条路上，总是惬意无比。因一路上有着十足的田园风光，山峦起伏，茂林修竹。田间路旁有许多坟冢，一些墓前有石狮，墓碑上所刻“大清乾隆”“大清道光”等建墓时间清晰可辨。中途要经过六店子，这里有一处庄园古树参天，围墙阴森高大，听说在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某个部门首脑机关，不远处有医院和车队，冯玉祥在抗战时期修建的抗倭楼，刘伯承在大革命时期策划川南起义的指挥部也在这附近。更妙的是途中有一道小溪，溪上一座小石桥，旁边有一间低矮的小瓦房，在参天的黄葛树巨盖下，设有石桌石凳，还有一个小茶摊，行人大多要在此歇脚。一到秋冬天，门前房后的竹架上，打蔫的丝瓜冬瓜藤藤在寒风中随意飘摆，偶尔有乌鸦在此起落，活现出一幅元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意境画图。

但这次到校，我已经没有心思欣赏沿途风光了。寒风萧瑟，路断人稀，一片冷清。只希望能够早点到校，顺利领取我的口粮以充饥肠，莫要使“天涯断肠人”成为断命人。

走上最后一个山坡，可以望见抗战时修建的高高的警报塔了，这是虎头岩的标志。远处田野尽头是成片的楼房，挨着数过去，那就是我走大路时必经的总字421部队、河运校、邮电515厂、石油校、五一技校，这些单位的楼房里均驻扎有分属两大派的武斗队伍。

时近中午，农民已归家做午饭了，四野空无一人。没有了山林房舍掩护，我发觉自己孤零零一人，被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山峦上了。

“啪！”——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不知是谁扣响了第一枪？紧接着，“啪啪啪”，又是几枪。我仔细辨听，顿觉大事不好，这不是两派的武斗干将在相互对射，而是把我当作活靶子，在苦练射击功夫呀！

子弹先是“嗖嗖嗖”地在头顶上空飞过，不久他们调整距离，子弹便“噗噗噗”地落在我四周的土壤中。我不敢跑，那样更会成为子弹追踪的目标，被当成移动靶子练枪法！

我奋不顾身地扑倒在道旁的田埂下，脸嘴与潮湿泥土零距离接触，双手抱着脑袋，心里咚咚直跳。

这段田埂较低，我穿着厚厚的棉大衣，肩膀一耸一耸的目标仍然很大。枪声中只听到“猝”地一声，觉得肩上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扭头一看：哎呀，遭了！一团拇指大的棉花从肩上蓝色咔叽布里翻冒了出来，不敢想象，那粒刚入土的弹头是从我耳边擦过去的……

妈呀，差点挨枪子！我脑子一片空白，求生本能促使我机械地用双腿和两只胳膊匍匐用力朝前爬了十几步，一个斤斗翻到另一条田埂下，重重的一跌使我差点头晕麻木。在那条潮湿的沟坎里，我仰面朝天躺着，用手掌半捂住眼睛，生怕

眼前会突然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险情。

时间过得很慢，身上爬进了蚂蚁也不敢动一下身子，生怕一动就会产生意外。脑子里瞬间闪出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大概过了几十分钟，四周没有一丝动静，我确信那些歹徒们已经把枪瘾过够，去吃午饭了，就把牙齿一咬，下定决心，凝神聚气，突然一跃而起，以百米冲刺速度迅速跑下山岗，脱离了危险区域。

一路下梯坎，小跑到学校，气喘吁吁地到伙食团旁边的办公室找到黄老师，他惊讶地打量了我一眼，也不多问话，微笑着把表册递给我签字，发给了两个月共64斤“重庆市搭伙券”。

转身到伙食团，炊事员罗大汉早就收拾好炊具半掩着门休息了，我忙买了一点冷饭冷菜草草吞下，心潮仍旧难以平静。

饭后到教室里看留校同学下围棋，对他们讲了我途中的遭遇，满以为会博得大家同情安慰。哪知他们好像觉得我是大惊小怪，危言耸听，仍旧专注下棋，爱理不理，不屑一顾。那个王同学居然随口说道：“你这算啥子逮哟！”那口气好像显示他们都是经过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我的这件棉大衣，是文革前利用几个寒暑假打猪草割牛草赚的钱买的，是九成新的当家棉衣。下午我绕小龙坎乘车回家后，怕大人们受惊吓，谎称肩上的破洞是在学校寝室里看同学下棋，被挂在屋子里取暖的聚光灯烤糊了所致。

母亲不明真相，一边责骂念叨，一边找出针线，心痛地用一小块颜色相近的蓝布将棉衣肩部补了个疤。这个小疤，虽然没有李玉和铁路制服肩上的大，仍旧十分不协调，参加工作后不久就让这件衣服“退休”了。

左邻右舍都有人倒在流弹下

1968年上半年，重庆武斗重开，战乱再起。子弹又在石桥铺场口上空胡乱飞舞。学校已“停课闹革命”一年多，小孩和学生无所事事，可以不出门，一有动静就朝自家挖的避弹坑里躲藏，倒也相安无事。可是大人们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要谋生计，要“抓革命，促生产”，每天早出晚归挣钱养家糊口，于是悲剧相继发生了。

大概是在1968年的5、6月份，天气已经开始暴热，左邻李家50来岁的当家人李玉书，在离场口两公里路的石桥公社六店子大队副食店值夜班，清晨被人发现倒在茅坑边上，已经掉了气，后颈窝有一个不大的枪眼，流的血也不多。这里距离河运学校、石油学校、五一技校不远，附近还有一个射击俱乐部。究竟谁是肇事者，不得而知，虽然是几个学校枪弹射击的有效范围，但谁也不会认账的。

李玉书是综合商店职工，是个重庆人说的“老坎”——老实人，因为口吃，平时不多言多语，只知道做事干活。几个儿女也被教育得谨小慎微，全是党团员，清一色的“保皇派”。“一月夺权”时，在学校当教师的大女儿被本校造反派抓起来批斗游街，戴着高帽打着锣从场口经过，被他们家人认为是奇耻大辱，颜面丢尽。

父亲死亡后，他们一家居然噤若寒蝉，可能想不明白他们天天讴歌的伟大领

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居然会夺去了亲生父亲的宝贵性命！他们只能躲在家里偷偷流泪，尸体在家门口停放了一天就匆匆送到火葬场火化了。

不到一个月，右舍张家又传来噩耗：当家主妇雷素珍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莫名其妙地中弹倒在血泊之中。

雷素珍，女，35岁，川东垫江人，嫁给石桥铺综合商店日杂门市的张树森为妻，生育二子一女。大儿子得脑膜炎留下后遗症，七八岁时死去了。

雷素珍体格健壮，勤劳贤惠，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街坊们有目共睹。为给病孩治病，她曾到医院卖血。夏天卖冰糕，冬天割猪草，有机会还去工厂做临时工，挣钱补贴家用。这一次是在钟表厂做临时工，下午5时下班，顺公路步行回家，快到石桥铺派出所附近的公路桥时，不远处五台山周围隐隐响起一片零乱的枪声，一颗从天而降的子弹从她右肩穿进，左乳穿出，血流遍地，倒地身亡。

尸体照样停在张家门口，一张白帕盖住了脸，门上贴了一张正方形的草纸。张树森面无表情，木讷地从日杂门市拿回一串火炮，噼噼啪啪地燃放。刚满15岁的女儿张玉琼“妈呀，妈呀”地喊叫着，哭得昏天黑地，几次栽倒在母亲脚下。12岁的小儿子张玉泉也跟着姐姐趴在地上，对着母亲遗体不断地磕头，“呜呜呜”地流泪，那场面，人见人悲，不忍久睹！

我们场口只在50年代病死过一个姓何的老太婆，是停放在她自家的堂屋里。现在接连遭受流弹袭击，非正常死亡两个中年人，且都停放在家门口街檐下（因为家里实在窄小），过上过下的行人除了表现惊诧，表示同情之外，更增添了对武斗的恐惧感。

我回想起那次领粮票途中遇险，遭到同学们嘲笑，心中十分的不服气。现在看见两位邻居无辜被流弹打死，觉得自己挺幸运，那件事真的“算啥子逮哟”！

窦老太爷的棺材被人抬走

场口居民中，窦老太爷是长辈级的人物。他生在清光绪年间，经历民国，到共和国文革时期已超过60岁，算是三朝人士了。我们两家是对门邻居，5米宽的街距使我们天天开门相见。

窦老太爷是木匠出身，辛苦忙碌了大半辈子，挣下一间位于场口的大瓦房，养大了非常争气的一子二女，都有着令人满意的工作，过着衣食无忧的平民小康生活。

该享清福的窦老太爷闲不住，仍旧拿起推刨锯子扁刀锉子，做些水桶板凳箕刷把之类，每逢赶场天，摆在家门口卖给居民或农民，日子过得很滋润。后来政府不准私人搞自由买卖了，他也就免费帮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修修水桶，补补篾席，口碑很好。

窦老太爷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百年之后能土葬，带一副好棺材到阴间享用。从我记事之时，就看见对门窦家，在临街的堂屋一角，搁置着一副棺材，那棺材有两米来长，近一米高，用厚厚的柏木做成，每年用油漆刷涂一遍，显得敦实厚实，过路人一瞧见，少不得夸奖一番：“好一副棺材！”窦老太爷听后很是得

意，张开缺牙少齿的嘴巴笑呵呵地不说什么。

1966年8、9月份，一群红卫兵路过场口，看见了那副棺材，扬言要破“四旧”，说保留棺材是典型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必须破除革掉，勒令他
把棺材处理掉。

第二天，窦老太爷用几床草席把棺材遮盖起来，那群红卫兵却没有继续来找他的麻烦，听说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全国各地大串联，学习造反经验去了。

经历了极不寻常的1967年和1968年大半年的武斗，到1968年秋天，大联合的舆论渐渐加强，一些单位都在筹备建立“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窦老太爷含着叶子烟杆，站在场口，喜滋滋地说，武斗结束了，要过太平日子啦！

然而，他对时局估计过于乐观了，有一类事情不可避免，就是毛主席所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那天一清早，窦老太爷从“官茅厕”（公共厕所）回来，发觉自家大门口情况异常，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伙拿枪的人，正在抬他家的棺材。四名赤膊大汉抬着棺材朝外走，窦老太婆和两个小外孙哭哭啼啼拉住绳索不让抬走。

窦老太爷一边责问：“你们是哪里的？”一边要阻止这伙人抬走。那些凶神恶煞的持枪者并不回答他的问题，一掌推开他，齐声喝道：“快抬走！”

街坊邻居围了上来，谴责这些人连棺材也要抢。几个拿枪的用刺刀逼开群众：“让开让开，不然刺刀见红啰！”群众被刺刀逼开一条路，四个大汉抬起棺材就走。窦家那个外孙拖着一条因小儿麻痹症带来的不利索的腿，要拉住抬绳，却扑空跌翻在地，他一只手撑地，一只手依然把手高高伸起，那样子简直是银幕上旧社会的穷人苦儿，呼天抢地哭号挣扎的镜头再现。

这伙人把棺材抬到公路边停靠着的一辆大卡车旁，装上卡车，在十字路口围着中间那株高大的法国梧桐树转了一圈，便沿大石路朝市中区方向绝尘而去。

可怜窦老太爷坐在椅子上唉声叹气，大病一场，许久没有出门，他搞不清楚他的宝贝棺材被哪个挨枪子的短命鬼占用了？在那个动乱年代，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偌大一个重庆城，许多死人伤人的案件都查不清楚，何况一副棺材？

窦老太爷经历了那次劫难遭遇，福大命大，病好后居然身体比原来更加硬朗，与老伴一起又活了整整三十年，直到90高龄后才相继谢世。当然，他再也不能躺进他的好棺材里了。

粮店买米发生血案

1968年7月的一天，我站在场口的高坎上，发现公路上出现一个怪现象：十多辆罩着帆布雨篷的军用卡车，风尘仆仆地从石新路驶来，顺大石路方向驶去。第一辆卡车车头前，立着一块标语牌，写着四个醒目黑体大字“运粮车队”，紧接着编了顺序号的卡车一辆接一辆通过，最后一辆卡车上也竖着一块牌子，与第一辆卡车遥相呼应，牌子上写着“车队过完”。

站在旁观人群中的老秦说：“城里缺粮，军车在帮到运大米。那运粮车队的标语牌是提醒沿途的各路武斗队伍，不要产生误会。”

频繁持久的武斗使重庆公路铁路水运相继中断，偌大的城市，上百万市区人口每天要消耗多少粮煤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呀！断米断煤缺盐少油就成了居民常有的恐慌。现在用军车从周围的专县调米运进城，这肯定是执政者迫不得已的临时紧急措施。

我亲眼目睹供销社油腊门市前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刚从打菜油的人丛中拼命挤出来，瓶子被人一挤，就掉在地上摔碎了，菜油流了一地，她毫不顾忌众人的目光，站在那里嚎啕大哭，周围的人无不深表同情，连声哀叹：“可惜了，可惜了！”

石桥铺街道狭长，我们场口有点吃亏，因为供销社的饭馆、糖果店、油腊店，食品公司的肉店，蔬菜公司的菜店都位于街中间地段，对各种商品货源供应的消息相对滞后。全靠我们养成了团结互爱的风气，一旦有人发现街那头菜市巷的菜店有货供应，立即跑回来沿街吼叫：“快点去买菜哟，菜拢了！”各家各户立即有人提着篮子冲出来，朝菜市巷迅速跑去，那场面完全是疯抢。

我们只具备一个优势，就是粮食公司的粮店离场口只有六七十米，每次运粮汽车的到来我们都了如指掌，所以我们买米一般都能抢占先机。

粮店是我们那截街唯一的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木板楼上是库房，楼下是营业部。楼上的米顺着一条金属管道流到楼下的磅秤桶里，由司称员操作隔板控制过秤。因周围陈家坪、歇台子、白马凼、巴山几个小店无粮供应，居民、农民和周围厂矿企业单位的职工家属都赶到石桥铺街道的中心粮店来买米，这里常常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那天中午，一辆解放牌卡车运了满满一车大米在卸货，狭小的粮店顿时秩序大乱。有几个农民主动上去义务帮忙，汗流浹背地将百斤重的米袋扛在肩上，顺着楼梯运到楼上堆放，他们的条件是米卸完后，可以得到不排队优先购买的照顾。

本来这里有持枪的造反派学生负责维持秩序，可是面对拼命朝前拥挤的人流，他们无论怎样喊叫：“不要挤，排好队！”却没有任何人理会。

见压制不住骚乱的人群，一名造反派学生急了，举起半自动步枪一扣扳机，朝天就是“砰”的一枪，涌动的人们吓得一下子静了下来，规规矩矩站在原地不动。与此同时，粮店木楼上传来一声痛苦哀叫，原来这一枪穿过木板，正巧击中正在楼上卸米袋的一个青年农民的腿部，鲜血一涌而出。

肇事者和粮店工作人员慌忙用毛巾捆住伤员大腿，利用尚未卸完米袋的解放牌卡车，十万火急地把他送到新桥医院急救。由于抢救及时，肇事者及其同学、粮店工作人员当场献了足够的新鲜血液，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听说那个青年农民打算国庆节结婚，不知后来是否如愿？

夭折的场口小“乐队”

文革期间，大多数中小學生没有啥事可做，既不能到校上课，又不愿参加社会上的文革活动，只好在家闲耍。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家长做家务，挑水挑煤、买米买菜、洗衣做饭，或者上街看看大字报，到公路上看那些戴红袖章的人

搞派性游行，看耀武扬威的武斗队伍和坦克兵车过路。

武斗反反复复的折腾，柴米油盐菜都出现困难，除了帮助家庭排队抢购这些日常生活物资，余下的时间，我们场口的男孩子就在家摆弄诸如二胡、笛子之类的简单乐器消遣，女孩子则搞一些时髦的“三忠于四无限”内容的刺绣、钩钩针之类打发时光。

1968年国庆节过后，市内基本上没有武斗发生了，场口出现了难得的平静。劫后余生的我们心血来潮，居然把家里乐器摆了出来，大起胆子搞起了一支小“乐队”，庆贺和平降临。

提议把各家的乐器弄到一块进行齐奏，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街上乐器搞得好的大多参加了派性宣传队，令人羡慕的是他们每次演出任务结束后，可以在接待单位“吃油大”（即吃肉）。我们这群水平低进不了宣传队的圣（剩）人和贤（闲）人，只能在家独个操练，自娱自乐。总感觉没有气势，技术水平也显露不出来。

我家外屋高孀孀的男人老周，是茄子溪木材综合工厂的工人，他自己用梧桐木做了一部扬琴，虽然外观粗糙土气，没有上漆，但音高音准音色都还可以过关。在家休息时他就敲打一阵，那首《歌唱二郎山》是他的拿手，因为他在50年代去雀儿山修过康藏公路，特别怀念那段艰苦光荣的历史。他不在家时，他14岁的大儿子周巧华就整天学习敲扬琴，而且超过了他老汉的演奏水平。

现在大家要凑到一起玩乐器，因每户人家的房间都很窄小，加之大人时常在家，时空受限，很不方便，我便提议到场口那间空房子去活动。

空房子是场口的一间平房，约有20平方米，没有门框，是街道运输队搁置板车的库房。如果把十几辆板车尽量靠拢摆顺，就可以腾出一块空间，足够我们几个人开展活动了。

大家吃过晚饭，不顾家长们的劝阻，急忙忙处理完家务，就自带板凳，集中了一架扬琴、一只笛子、一把板胡、两把二胡，凭借场口街边路灯的微弱光焰，在这块小小的地盘里开始了乐队齐奏。

我学拉二胡很大程度上是受斜对门老秦的影响。老秦长我六七岁，三年困难时期初中毕业，因“家庭成分不好”，没能考上高中，参加了街道运输队当人力搬运工。下班后为解闷消愁，经常坐在场口那颗洋槐树下拉二胡，他拉刘天华那首《病中吟》，能使得许多媳妇大娘伤心落泪，是街坊们公认的二胡高手。曾经有人邀请老秦参加造反派的宣传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断然拒绝了，理由是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歌。

他确实不会这些新歌，比如《万岁，毛主席》、《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远飞的大雁》等。我曾经把这些歌单借给他学，哪知他又把歌单还给我，说学不会。他只会《光明行》、《病中吟》、《良宵》等老曲子，因此只能在一旁当观众。

周巧华的扬琴是乐队的核心。扬琴算是我们这伙人中最高级的乐器了，我们定调起音都依靠它。

吹笛子的也姓周，燎原中学初三学生，他那只笛子按当时市价大概不会超过1元，是一吹到高音就跑调的那种，而且只能吹一个调，很多时候只能凉在一边

当“相公”，于是他多半时间也是拉二胡。

板胡由我15岁的四弟掌握，声音高亢尖利，有点刺耳。二胡由我和张玉泉应付。张年纪最小，刚满13岁，他的母亲就是几个月前被流弹打死的雷素珍。现今他已经流干了眼泪，而且“化悲痛为力量”，成为我们乐队的一名忠实成员，虽然常常找不到调门，一招一式却也挺认真地跟着我们“伙”（川语，随大流之意）。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和乐器，从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开始演奏，接着是《北风吹》以及其它歌颂红太阳的歌曲。一首完毕，立即有人倡议下一首演奏什么歌，不休息，不间断。在浓浓的夜色下，把场口搞得热热闹闹。

有少数街坊邻居听不得吵闹，提出抗议，我们不予理睬，坚持埋头操琴。渐渐地他们习惯了，反正忍受痛苦也就个把小时，经历过武斗担惊受怕的日子，吹吹打打的乐曲声似乎还可以丰富文娱生活，减轻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也就不再说东道西指责我们的这不是那不是了。

所谓熟能生巧，一周后，我们乐队奏的曲子不但给街道带来喜气，而且像模像样，声名远扬。队伍扩大了，鼎盛时达到8人。特别是增加了一部手风琴和一把小提琴后，乐队整体素质上了一个新台阶，因为这两位琴师是宣传队的“现役”队员，乐理知识和演奏水平高出我们一大截，加之手风琴阵仗大，奏起来更欢快，更响亮。

这样，一到晚饭后，附近半条街的大人小孩一听见响动，都跑过来围着我们看热闹，有的还跟着唱起歌词，俨然成为一台文艺演出晚会。

可惜好景不长，一次意外发生的事件使我们乐队夭折了。

文革以来，“打砸抢”之风盛行，有人甚至喊出了“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真枪实弹的武斗爆发后，一般的打砸抢就不值一提了。停火交枪后，打砸抢仍然没有断绝，其中较为常见的，就是抢军帽。那年月戴军帽是一种“革命”时尚，因此抢军帽似乎也成了“革命行动”，时有发生。

那天晚上我们正起劲地演奏到一支歌颂解放军的曲子《金珠玛米亚古都》时，正在围观人群中看热闹的一个民中学生，外名叫“二癞子”的，忽然狂叫一声，原来他头上戴的军帽被人抢走了。二癞子这顶军帽洗得发白，已经很旧了，但他依然视为珍宝，一出家门就戴在头上，得意得很。

抢军帽的是附近模具厂原“千钧棒”战斗队的一名青年学工，还没有来得及转身跑脱，就被二癞子一把扭住，双方抓扯起来。

观众人群立马大乱，惊慌避让，老秦急忙喊叫：“快把乐器收好！”抓扯中军帽忽然飞落到扬琴上，周巧华还未反应过来，二癞子已经奋不顾身扑了上去……只听得“哗”的一声，扬琴被掀翻落地，琴弦跌断好几根，其中一根弹蹦起来差点刺伤二癞子的眼睛。

演奏会不欢而散，周巧华自认倒霉，为配琴弦伤透了脑筋，要买琴弦必须到沙坪坝或解放碑，他父母又不肯出钱，此事就搁下了。

家长们有了更加足够的理由禁止我们在场口摆弄乐器了，断言我们如果继续

坚持搞下去迟早会出事，而且是大事！

于是，我们这支鼓捣了二十多天的小乐队便不得不宣布解散了。

文革过去四十多年了，那些武斗的腥风血雨残留在记忆里，难以磨灭，往往使我夜不能寐。看过一些反映文革风云的作品，大都围绕官场显赫人物的争斗而展现，而在文革中遭受灾难最多最直接的平民百姓则鲜能登大雅之堂，他们的痛苦无人知晓。我们武斗边缘地带的居民尚且如此，那武斗中心地段的百姓生命安全和生活状况更是难以想象。这篇小文，就想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回忆一些当年情景，让不了解文革的后人多少知道一点历史的另一侧面。

【书海泛舟】

《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前言

编辑整理者

按：《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是由北大校友丛璋、亚达、国真编辑整理的一本自印书，已于2012年8月自印分赠部分北大、清华校友及北大、人大图书馆。该书共收入38篇文章，分编为六个栏目。编辑整理者现正在编第二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40年，我们这些当年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已成为年近古稀的老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近年来，对清华大学文革的研究有了一些进展和突破，曾任清华党委第一副书记的刘冰出版了回忆录，414的头头沈如槐写的回忆清华文革的书也正式出版了，有人正在帮助蒯大富撰写回忆录（本刊注：韩爱晶以“许爱晶”之名所写《清华蒯大富》一书已经正式出版），还有以下清华校友和学者的著作也出版或印刷出来：

1、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2、孙维藩《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7，香港

3、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香港

4、叶志江《走出文革》，校友赠阅，2010

5、唐金鹤《倒下的英才》，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香港（本刊注：此书修订版已于2013年1月出版）

6、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校友赠阅，2011

（本刊注：此后还有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香港）

此外，在清华校友网的校友社区里，不少校友也撰写了一些清华文革回忆和反思的文章，并进行着讨论。以上著作对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内幕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揭露和研究，并对清华文革中的不同思潮进行了分析和反思，值得借鉴和参考。

相比之下，有关北大文革历史记录和研究的著作显得十分稀缺，影响比较大的只有聂元梓在香港出版的口述回忆录和季羨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其它人的回忆和研究文章大都是片段的，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聂的回忆录固然也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但她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辩护和翻案，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甚至还有一些谎言；季先生的回忆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但也不是对北大文革历史的全面记录和研究。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北大文革历史的研究和反思如此缺乏？分析起来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不敢研究。由于文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禁区，官方对出版有关文革的著作有限制，冲破禁区有难度，有风险，使很多人对此望而生畏；

二、无暇研究。文革中的北大人大多经历农场改造、上山下乡，受苦受难，文革后忙于自己的生计和业务，很多是单位的骨干，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从事研究；

三、缺乏资料。文革中的原始资料虽然汗牛充栋，但大多已被销毁或流失，在个人手中保存很少，文革档案属于保密范围，一般人不允许看，一些重要的当事人、知情人已经故去，以致很多事实的真相难以探明，成为历史疑案，研究起来难度很大。

北大是文革的发源地和重灾区，文革过程错综复杂，上层人物对北大的影响和干预很多，文革期间北大发生的事件也影响着北京甚至全国的形势发展。我们是文革前进入北大的学生，是北大文革的亲历者和受害者，虽然离开北大已经40余年，但对北大文革期间发生的多数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前几年就有校友提议应该抓紧时间撰写文革回忆文章和收集文革资料，得到许多校友赞同，但遗憾的是实际工作进展不大。为了帮助校友们回忆和开展研究，我们收集整理了部分有关文章以供参考，其中有些直接由校友提供，有的是从已发表的刊物或网上收集到的，限于条件，未能征得部分作者的同意，请作者原谅。

这本资料汇编分为六个部分：**一、风云乍起。**主要内容为对第一张大字报产生背景和北大文革起源的探究；**二、文革亲历。**几位经历了北大文革的师生记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其中杨勋老师和奚学瑶同学的回忆比较全面和系统；**三、武斗真相。**是当时不同派别的学生和经历了北大武斗的校外人员对武斗过程的回忆，应该说比较客观和如实地揭露了北大武斗的真相；**四、祭奠冤魂。**收录了王友琴女士对北大文革中惨死的师生和其它人员情况的研究，还有几篇是对翦伯赞、沈达力、李人杰等人死亡情况的回忆，作为对亡灵的祭奠；**五、文革反思。**主要是针对北大文革和聂元梓口述回忆录进行的评论和反思；**六、文革轶事。**对北大文革中发生的几个事件，如所谓“林立衡被迫害”事件，邓朴方致残事件进

行了探究，十分珍贵的是当时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对聂元梓一些活动的回忆，还有一些反映当时校园的真实面貌的小事。

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十分有限，远不能反映北大文革的全貌。这个资料汇编工作仅仅是个开端，希望经历过北大文革的老师、校友以及关心北大文革的朋友继续为我们提供有关资料、文章和照片，更希望当年北大文革中两派的负责人和知情者写出自己亲身的经历和了解的内幕，以推动对北大文革历史的研究工作。来信请发到 bjdx1960nd@163.com。

2012 年 8 月

【书海泛舟】

注意保存文革史料

《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 代后记

田健行

文革是史无前例的一场灾难。官方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只能是粗线条的，不可能更细致了。对于具体的人的处理也只能尽可能缩小打击面，以免造成动荡。历史表明这种处理方式是正确的。不然再搞一次大运动，全面算文革的账，人人自危，改革开放要到何年！

可是如今更深入地记录、研究文革，似乎还是一个禁区。许多史料仍待收集、整理、分析。甚至时至百年我们还没有一部官方的清史，一个甲子还没有民国史。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历史上一个新朝代建立后修前朝史是一个重要任务。元代是个比较短命的朝代，在元朝灭亡前不久，由丞相脱脱主持修了辽、金、宋三代史，尽管水平并不很高，但由于及时保存了许多重要史料，也算功不可没。这个脱脱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过生不逢时，不可能挽狂澜于即倒。如果这个任务留给明朝，恐怕就更为困难了，也许官方修史的传统就要由此中断。

保存历史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们总不能学历史上的印度。中国最重视历史，而印度古代最不重视历史，以致印度古代史许多内容要到中国找。

文革从开始到今日，45 年已经过去（从 5·16 通知算起），结束也 35 年了。凡在开始时像回事地（即不仅是作为小学生喊喊口号、起哄的）参与者，都已年逾花甲。文革开始时（1966 年夏）的初二学生，现在也到了退休年龄。由于文革期间的大混乱，史料保存本来就比较欠缺。我文革前就天天记日记，但文革开始就停止了，而且将原有的日记全部销毁以免招祸。而且那时有许多文献资料今日是正面的，明日就可能成为反面的。我曾经有一套《林彪文选》，得知林彪折戟沉沙后在还没有正式传达时就烧掉了。人们当时保留这些反面文献是要冒相当风险的。如果有人现在能够拿出全套的新北大公社的动态报，应该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世界之最。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不仅仅是官修的二十四史，而且包括汗牛充栋的民间野史。保存历史，不仅仅是官方的任务，而且也是民间有志者的任务。民间史料可分为几个部分：一是成部的著作，二是专门的但不成为史书的著述，三是散见于其它文献中的史料。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将来需要修一部文革史，民间史料将是一个重要的来源。文革的混乱和错综复杂决定了有关史料的多样化。下面以北大为例。北大当年是文革的一个大漩涡。5·25大字报究竟是怎么出笼的？康生、曹轶欧是指使、授意还是暗示？6·18事件不可能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有的文章说是聂元梓制造的，但没有足够证据。聂元梓为什么和谢富治作对？第一批工军宣队与聂元梓的关系……这尽管只是北大的事，也都是文革中事关大局的事件。再如571工程纪要，一个谜是在林彪集团销毁大量重要证据时为什么单单留下这样重要的文献？我们又该如何解读纪要中提出的许多问题？由此又会引起多少思索？历史文献不仅仅包括正面的，而且必须包括反面的。由于反面文献更容易散失，抢救反面文献更为重要。

现在民间修史的困难比以往的历史时代更为困难。首先因为信息太多，我们难以全面收集。而一部缺乏足够信息的史书非常容易以偏概全、走入歧途。没有得到官方支持的民间修史历来就是风险极大的，康雍乾的文字狱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如此，而且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也非少数人所能胜任的。特别是此项工程需要足够的学力。对于有志于保存历史的朋友，有可能做到的是记叙能够掌握的各种史料。我的同系学长叶永烈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我们没有能力建大厦，但是有可能为建大厦准备一些砖瓦、预制件。甚至对文革期间自己的作为的反省也是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可以让后人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为什么会出错。

如今也有许多方便的条件。过去史料如果不能印成书，只好手抄，数量既少，反复转抄也容易出错。《尚书》的传承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现在我们可以用电脑处理、上网传播。至少我的文章就不是以发表出书、获得名利为目标的。能够留下史料、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我就满足了。我们把自己所知道的历史成文记载，已经是一种抢救。再过10年，许多人离去，在者也更加年老，记忆在逐步散失。到那时可能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一些人可能至今也没有转过弯。那个出版了回忆录的老佛爷就是典型。从保存史料方面来讲，这些奇文也自有其史料价值。再过几年，老佛爷上西天，我们就没法找到那些资料了。

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恐怕多已年老力衰，难有能力去写整部的文革史了。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写作一些史料文章，对大多数人应该还没有太大的困难。建不成大楼，准备一些砖瓦水泥钢筋总可以吧。2009年我看到一本《文史精粹》，上面有司徒文的《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其中引用了我的一段回忆。看到这里，我不禁感慨：我已经成了历史。一个人成了历史就说明他已经老了。我们既然已经成了历史，就应该争取多留下一些史料，为后人留下一份遗产。

【编读往来】

丁颖来信纠错

第17期《昨天》中，顾训中《徐景贤罪名考》第一节“徐景贤犯的是反革命罪吗？”中，有一处笔误：“据说，华、叶等人动手之前，曾仔细分析过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构成，结论是，若通过召开中央全会，则解决‘四人帮’问题没有把握。”

此处，应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阎长贵谈17期

17期的文章通读一遍，我觉得篇篇精彩，对推动文革研究有很大意义。官方文革史所以存在很多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听亲历者、当事人的诉说，他们回忆真实的历史往往还会犯忌。文革亲历者、当事人站出来说话，这是写一部文革信史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清华大学的文革经历者们又走在了前面，兹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敬意。像清华孙怒涛这样敢于回顾历史真相并作出认真反思的人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在现在文革研究还有禁区的情况下，进行各地、各系统、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即像王年一先生说的“眼睛向下”的、“局部的”或“社会”的广泛研究，太重要了。看了17期《昨天》的这些文章，我对文革研究充满了信心。文革发生在中国，只有中国人才能研究清楚，外国人不可能成为研究主体——当然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可忽视，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学习和借鉴。记得我说过多次，文革研究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大集体的事业，决不是哪一个英雄好汉单枪匹马所能成就得了的。读这期《昨天》使我浮想联翩。

另有两个问题提出与作者商榷：

《“九大”前山东的“反复旧”》一文第四节中说：“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春桥想管事没人理他。”我印象中，有关许、张关系的这种说法，是文革后流行的。许世友和张春桥（以及和江青）当时的实际关系到底是不是这样？能否有当时的资料加以佐证、说明？

《徐景贤罪名考》一文中说：“当王洪文的工总司进攻上柴联司时，毛在上海通过电视观察了暴力镇压过程……”这一史实，无论对研究上海文革还是研究毛泽东都很重要，但不知其材料来源是什么？对此能否有更详细的介绍？